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09 年

高放：什么是党内民主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

反腐败的取胜之道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柏林墙倒塌目击记

目 录

一家言

- 1 什么是党内民主 高 放
6 民主是党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树斌
8 反腐败的取胜之道 辛 宇

求实篇

- 13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 蒋燕燕
20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 严迎春

人物志

- 23 白求恩：孤独的异邦人 林贤治
26 范长江论言论自由 王咏梅
32 晏阳初与卢作孚 苟翠屏

亲历记

- 39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顾英奇
43 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 燕 凌

忏悔录

- 47 我斗胡耀邦 老 鬼

往事录

- 49 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 朱 良
54 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 陈桂棣 春 桃
60 大跃进中的村办劳动教养 肖 磊

轶闻录

- 63 种一个“毛主席万岁” 毕星星

品书斋

- 65 读《告别饥饿》 徐迅雷

随想录

- 68 由奥巴马摆酒平风波说起 魏兴荣

海外事

- 71 柏林墙倒塌目击记 李 英
79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思 源

编读窗

- 87 读者来信摘登 郭远庆 等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淦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什么是党内民主

• 高 放

一、政党的由来和特性

问：您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工作六十年，历经风雨，请谈谈什么是党内民主？

答：这首先要从政党的由来和政党的特性谈起。现代政党是社会化大生产、商品市场经济竞争和议会民主斗争的产物。最早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形成了保守党与自由党，美国出现了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些都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中起过重大作用。我认为政党具有五个特性，即阶级性、政治性、组织性、前沿性（站在政治斗争最前沿）和民主性。民主性最重要，失去民主性政党就变成个人专制或寡头专制政党，专制党最终必然灭亡。

问：专制党为什么必然灭亡？有实际例子吗？

答：我认为政党政治也有五个特性，即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值性。政党要公开争取群众支持，在竞选中得到多数选民拥护才能上台执政。专制政党由党首独断专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最终必然被群众抛弃，甚至被群众消灭。例如历史上德国纳粹党，原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年成立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蒙蔽工人和广大选民，1933年在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竞选获胜上台执政，随即实行法西斯专政，党内由希特勒个人专制统治，党外取缔其他政党，发动侵略战争。1945年战败后，该党被禁止活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西班牙弗朗哥的长枪党等法西斯政党最终都灭亡了。

问：可是至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共产党领

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执政后又掌握有强大武装部队，又没有其他政党与共产党争夺政权，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苏联、东欧八国加上蒙古、柬埔寨共11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也都灭亡或者改变性质了呢？

答：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共同点是党内缺少民主，实行领袖个人或寡头专制，所以最终都被人民抛弃，或者被迫改变性质，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等，另求出路。

二、马恩列开创的党内民主传统

问：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怎么也会变成专制党？正常的党内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呢？

答：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参与政治斗争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来的。要认清共产党党内民主就要论从史出。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共产党党内民主在党的建设和执政过程中的重要性。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党，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他们所写《共产党宣言》成为共产党的纲领文件。

第一个共产党党章规定了党内实行民主制的原则，做出党内民主的示范，具体表现为5点：党的各级领导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不是上级委任的；党的权力中心在全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召开一次；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和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定期向党员和党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审查。第一个共产党存在了5年时间，1852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被迫解散。

从 1869 年起各国先后重新建立工人政党。这时共产主义曲高和寡，工人大多向往社会主义，所以通称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或工党。1898 年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内右派已经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到了，于是于 1918 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这时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已经 71 年，世界上的第二个共产党才出现。中国也是在俄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帮助下，1921 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问：我国共产党执政后怎样实现党内民主？

答：俄国党在地下斗争时期强调集中制，难以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党内民主实践是完全遵循 18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个共产党党章中规定的 5 点民主制原则的。各级领导人选举产生，权力中心在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共产党 6 年，召开了 6 次党的代表大会，在 1918 年——1920 年内战和外战的环境下坚持开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每次召开代表大会列宁都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大会审查。在党代会召开之前，由党报《真理报》开辟“争论专页”，就党的路线方针问题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开展辩论。在党代会上列宁作简要工作报告，并不是照念长篇大论的稿子。另外由不同意中央观点的人作副报告。两种观点供代表审议。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争论，有插话，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评论和建议。大会上除讨论中央设定的议题外，还有代表们的提案也要付诸审议。最后表决时每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大会的决议通过实践检验，如有错误，在下次大会上复议改正。如 1921 年十大通过了新经济政策，改正了此前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每次大会闭会之后立即公开出版发行一本厚重的大会速记记录，使全党全国都了解大会的全部情况。这才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除此之外，列宁对党内民主还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另外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不属中央委员会领导，直接由党代会产生并向党代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是否执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有误差。

三、苏共怎样变为专制党

问：后来苏联共产党怎样变成了专制党？

答：1924 年列宁过世后，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斯大林把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越拉越长，他多次修改党章，把年会改为 2 年、3 年召开一次，实际上从 1939 年至 1952 年相隔十三年之久才开代表大会，到 1952 年苏共十九大，他又在党章中把代表大会改为四年召开一次，1934 年斯大林还修改了党章，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改为监督下级地方组织是否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从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制度名存实亡，从此党中央再也没有机构能够对之进行监督。在代表大会上越来越难以发表不同意见，越来越狂热地歌颂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斯大林。从 1925 年——1929 年消灭、清除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三个反对派后，苏共变成斯大林一派专制的党，到 1938 年斯大林实行大清洗，消除了所有“异己”后，进而实行个人专制。中央委员会也不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政治局开会时大都是斯大林一个人发号施令，其他委员各自忙于记笔记，散会后各自去执行。这样斯大林把列宁创建的民主型共产党变成个人专制政党。

问：破坏党内民主给苏共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难免犯错误，如果有党内民主制度，就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但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制度，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这种体制就使得教条主义、急于求成、高干特权、脱离群众等错误代代相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统治十一年（1953——1964），把总书记职称改为第一书记，依然是个人专断。如果他不是 1964 年被迫下台，肯定也是搞终身制。之后，勃列日涅夫统治十八年，苏共加强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寡头专制。勃列日涅夫又恢复总书记称号，而且身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掌党政军三大权，又实行终身制。他还修改党章，把党代表大会由四年改为五年召开一次。1979 年苏军入侵

阿富汗只由政治局 4 个人作出决定。这种专制体制拖延到 1991 年终于完全被人民抛弃。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苏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样苏共就悄悄自尽了。

问:我们看到,东欧有的共产党并非像苏共那样悄悄自尽,而是最后被取缔的。

答:是的,例如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自 1965 年(47 岁)上任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又任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大搞家族专制统治。国内经济状况糟糕,民怨沸腾。1989 年底群众集会抗议,他下令开枪镇压,引起爱国卫队哗变,他当即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罗共也随之覆灭。罗共曾拥有 350 万党员,全国人口才 2100 多万,成年人中平均每 4 个人就有 1 个党员。这么强大的党在个人专制之下,到关键时刻也是顷刻瓦解,没有人起来保卫党。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缺乏党内民主的党,即便党员众多,如果重量不重质,缺乏自觉性与战斗力,那也是乌合之众,外强中干。不要以为人多势众就力量大,到关键时刻就会兵败如山倒。

四、苏共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共党内民主的削弱

问:苏联共产党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影响?

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但是在缺少党内民主方面难免也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加上专制主义传统有 2000 多年,党内领导人有家长制思想作风。除此之外,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不得不强调中央集中领导。建国后又受西方封锁、遏制,进行过抗美援朝战争,国内还面临剿匪、镇反、土改、恢复国民经济等艰巨任务,这些都影响党内民主发展。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也还有主观原因。这就是从 1943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授予他在中央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后,尤其是 1945 年中共七大他正式当上中共中央主席后,党的集体领导体制有所削弱。1949 年建国后毛主席身兼四个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全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国政协主席)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个人,集体领导制更是削弱。这样难以充分做到民主决策。例如 1951 年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1955 年邓子恢反对农业合作化发展过快,1957 年周恩来反对冒进,1959 年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中过左做法等,都受到错误的批判。

问:建国前后是否党内民主一直遭到破坏?

答:那也不是。中共早期党章也是规定实行党代会年会制。从 1921 年——1928 年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六大至七大相隔十七年之久,因战争环境难以正常召开。1945 年七大党章改为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大会,但是拖到 1956 年才开八大。这时有很大的转机。1956 年秋,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国内外经验对党内民主有了很大改进。1956 年初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毛主席也深感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八大最重要决定就是修改党章,要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度,这是列宁时期年会制度的新发展。列宁时期每年春天选举代表,第二年开会重新选代表,开完会代表任务就完成了。毛主席提出要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在年会制的基础上增加常任制。选出来的代表 5 年之内都是代表,并不是大会开完就不是代

表了。八大还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没有列宁时期那么大权力,还是受中央委员会领导,不能监督中央委员会。

1956年召开八大第一次会议,按规定1957年要开第二次会议,但“反右派”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开党代会决定,而是由党中央少数人决定的。到1958年才开了八大第二次会议,这时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的方面,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之后长达11年之久都没有召开八大第三次会议,直到1969年才召开九大。八大的年会制度和常任制度都没有执行。这就是因为党内民主建设还不健全,没有机构能够监督党中央。

九大更不正常,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党代表大会改成相隔5年开一次。到现在还是5年开一次,这一点改革开放30年没有进步,依然沿用1969年九大的决定。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民主的进步

问:您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作何评价?

答:总体来说,这30年党内民主是有很大进步,总结了历史经验,党内终身制终于废除,防止了个人专断,加强了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在一些地方已试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以及党代表任期制。但是党内民主建设要真正完善,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最值得重视的是2007年,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17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历史性进步,也是继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之后,执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新认识。传统观念认为,共产党的主体是党的领导人,全体党员都要服从党中央,党的主体是中央和各级组织。现在党的领导人对于党内民主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是总结了长期以来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要真正做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就要切实完善十七大所提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个体制和机制。也就是要真正保障党员

民主权利,首先做到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按照党章规定,采取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各级党委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有不同意见时能够每人一票平等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通过实践检验,不断复议、调整决策。在中共建党88周年前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时,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提出“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凝聚共识。”如果在民主决策前能建立定期的党内民主讨论会,把重大问题决策草案发给广大党员民主讨论,我认为这对民主决策会大有裨益。党内民主在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也还有待切实完善。

问: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对党内民主作出新的决定,您有何想法?

答: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都热切期盼党中央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有新思路和新举措。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强调我们党要善于应对面临的各种危机,增强忧党意识,深刻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要重视以保障党内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但愿这个新决定能认真切实贯彻落实,党内民主会出现新气象、新景观。党内民主的较大发展,看来还有待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修改现行党章。因为党章中的一些传统规定是有碍党内民主发展的。例如,在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还没有恢复之前就实行党代表任期制,那么这些代表实际上只能起到各级党委调研员的作用,因为他们根据调研所提出的各种决策建议只能供各级党委参考,而不能参与表决。

六、个人对发展党内民主的建议

问:改革开放以来,您对党内民主建设有什么新建议?

答:我个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痛定思痛,就如何健全党内民主,从1979年起就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已经精选收入2006年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高放文集》之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我这本

文集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初版5千本,各地书店很快售缺,纷纷向重庆出版社再要此书,可惜未能重印。报刊上发表过14篇书评(都已收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都认为本书如杜鹃啼血,殷切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九十叟李锐同志读后还寄赠一首七律:“三十年来志未休,居高放眼反思尤。呕心泣血伤时泪,立说著书还我愁。柳暗花明因大悟,山穷水复不稍留。实施宪法须民主,维护人权靠自由。”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同志读后说:“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百科全书。”我这本文集共收入42篇文章,分为政治体制改革总论,民主、法治与政治文明,关于人民民主,关于党内民主,关于党际民主等篇,其中有七篇专门讲党内民主,特别重要的一篇是2005年6月参加中央党校内部研讨会时提出修改现行党章的十点建议,这篇文章另外收入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放自选集》。这十点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能有一个,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两个,党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种一个党有两个最高权力机关、两个最高领导机关的提法是不合适的,应该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学说,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2、要全党服从大会,而不是全党服从中央。由于我们党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党代表大会不能按期召开,党中央实际上代行党代表大会的职权,所以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提法的本意是“全党服从党中央委员会”,但是在实践中却逐步演变成全党服从中央政治局、全党服从政治局常委、全党服从党中央领袖个人。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很多的。

3、党代会要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

4、改进党的代表大会的开法。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召开六次党代表大会,每次都是只在会上宣读早已拟定的报告稿,分组讨论,大会通过,等等。没有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没有代表提案,讨论中没有批评只有赞扬肯定,小组讨论即使有批评也不公布,大家都不知道。如前所述列宁时期有

主报告和副报告,副报告不是补充而是反对主报告,提出两种意见观点供大家讨论选择,代表应该对中央领导人批评,指出有什么不对,这样才能发扬民主。

5、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现在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应该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每年应该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

6、政治局的地位和职权。按照现在党章的规定,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政治局及其常委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这样规定政治局及其常委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党服从政治局,政治局不开会就是全党服从常委。根据历史经验,政治局的职权与职责应该主要是实现中央委员会赋予的执行党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任务,它要每几个月定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并且接受其监督和评议。

7、中央监察机构的地位与职权。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中纪委,20多年来在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级纪委依旧归各级党委领导,这就造成了市级党委只能由省纪委监督,省级党委只能由中纪委监督,中央委员会没有机构监督,党章中也没有规定谁能监督中央。

8、党的领导人的职称,应该称主席不应称总书记,总书记应该是书记处首脑,不在政府机关兼职,专管党的工作,这样便于实行党政分开。

9、领导人任期和年龄,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但党章上没有规定领导人任期和年龄限制,只有很笼统的一句话,任何领导“职务都不是终身的”,这样辞职难以规范化、正常化。

10、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民主党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选举制度,其次才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党代表和各级党委领导干部都应该采取自下提名、差额竞选产生制度和随时可以罢免制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晨)

民主是党发展的必由之路

● 张树斌

一、为什么要推进党内民主

1、从理论上来说,推进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七千万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指南,理应得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及全国 370 万个党的各级组织的尊重和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制性’。并把这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行’的‘基本要求’。这就是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高调提出‘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并非是别出心裁,而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讲的:‘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

2、从实践上来说,不实行党内民主已经无法保障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推进党内民主,既是务虚问题,同时也是务实问题。胡锦涛总书记说:“发展党内民主”,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如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始终是党中央关注的重心问题。“整党”、“保先”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曾在全党连续进行,但无须讳言,成效欠佳,对全国大面积发生而人民群众又极度愤慨的吏治腐败问题,久治不愈,甚或愈演愈烈。因之,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创伤,基层党组织的涣散、软弱和公信力不强的问题始终不得恢复和提升。面对这种现实,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88 年之际,首次高调提出“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再一次自己给自己找到了病根。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的“病”在于“计划经济”,因而需要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我们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能划一个时代;那么,今天我们的“病”就在于党内民主不畅,因而积弊丛生,所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极有可能在“胡温新政”的领导下,将我国的历史重新划过一个时代。

二、怎样推进党内民主

推进党内民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切实贯彻落实的制度性实施方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部署”,“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积极推进党内民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使党内民主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党内民主建设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这就是说,推进党内民主,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使党内民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水平。

关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党章及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使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要牢固树立党员主体意识,把激发广大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党员权利保障机制,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为此,我认为,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些要求,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以下三条:

①全体党员的知情权。

知情权决定参与权。你不知情,如何参与?像目前这样,对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党员没有知情权,遮遮掩掩,不向党员交代真实的历史,何以接受教训,保证不犯同类错误。翻开中共党史,我党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都是由于党内不民主而引发的。如果广大党员有知情权、参与权,能犯“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左倾错误吗?如果广大党员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能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吗?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广大党员没有知情权,何以参与。以今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而言,我认为应早向全党公布:我们党要作出“关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的决定”,以便使广大党员积极建言献策,力争使我们的《决定》更先进,更有水平,更贴近真理,更贴近广大党员的心声。所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要推进党务公开,创新党务公开形式,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渠道,探索和丰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凝聚共识”。

②全体党员的选举权。

选举权,是党员基本的权利,然而,长期以来党员的这一基本权利并没有落到实处,形同虚设。关键是选举权和我们党一直沿用下来的战时委派制直接相逆。有上级的委派权,就没有广大党员的选举权,反之有广大党员的选举权,就不能有上级的委派权。所以,废除委派制,实行党内直选是实现党内民主的必由之路。通过党内直选的领导,可以同时出任地方和基层的行政职务,实行党政“一肩挑”。上级对下级有领导权,无委派权。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说“要丰富党内基层民主实现形式,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决策,推进党务公开,切实选好用好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就为实行党内直选铺平了道路。

③全体党员的监督权。

有无监督权是党内民主能否最终落实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提出:“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并把这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我认为,要实现广大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最重要的是纪检部门要独立,实行垂直领导,只受同级党代会和上级纪检部门领导,而不受同级党委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党委立法,书记执行,纪检监

督”的党内分权制衡体制。从根本上遏制长期以来形成的书记“一言堂”的局面。

总之,党务公开,党内直选,垂直监督,这是实行党内民主的核心。

三、推进党内民主的意义

1、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吏治腐败的局面。

吏治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弊端,特别是手握重权的一、二把手,贪占者不少。正因为如此,反腐倡廉工作成为我党的重中之重。然而,至今久治不愈。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腐败的根源。目前,实行党内民主的呼声甚高,足以印证一句古话叫“要知朝中事,山里问野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行党内民主,官员的任命权始终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那么,领导干部还敢贪污腐化行贿赂吗?再加之党务公开和垂直监督,任何一级的领导干部都置身于严密的监督下,既有群众监督——选票,又有组织监督——纪检。这样,就不仅能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各级领导的形象,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真正增强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能力。

2、可以大大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维稳”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维稳”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切工作的重头戏。一个很普通的案件,就可以引发一场大暴乱。说明社会已经严重不和谐。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的不满,对党风党纪的不满,已经到了要“发泄”的程度。一个社会,老百姓长期没有自己发泄不满的渠道,积压愈久,其爆发力就越强。砸汽车,烧政府大楼,警民对峙,这难道能叫和谐社会吗?这离亡党还有多远呢?所以,只有推进党内民主,才能平息老百姓的怨气,才能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党内民主这个管道借以表达自己愿望的渠道,由此,才能逐步将整个社会引向和谐之路。

总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中所言:“要提高广大党员民主素质和能力,坚持在实践民主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主中实践民主”,只要坚持沿着推进党内民主的路子走下去,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这肯定是一条金光大道。

(作者系山西省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山西临汾市双语学校校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反腐败的取胜之道

• 辛 宇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同时强调,“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改革开放搞了30年,与之相伴而行的,从反腐蚀到反腐败也历经了30年。这已经过去的30年,不仅是新中国,可能也是秦统一中国以来变化最大最快的30年。称得上一日千里,日新月异。

在众多评价中,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但是,与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的是,卷进腐败的金额之巨、人员之多、职权之重、级别之高,以及占据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的历史之最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着……即使中央对此的论断,也是多年不变的四个字:仍然严峻。其原因何在?中国未来反腐战略能否取胜,并将如何取胜?

得之于政改推动经改,失之于政改滞后经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门。但这个门是如何开启的,不少人都习惯于从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进行解读。大多数文章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说得不够,而且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是,这改革开放之门是用政改之力启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模式实行的是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

先以解放思想为号角,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其次,终止了领袖个人的高度集权,代之以党的集体领导;第三,通过重建中纪委,使党内有了比较合理的分权;第四,此前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其后5天的三中全会,身体力行了党内生活民主化,对全党起了重要的示范带头作用。这四项举措都是政改推动经改,从而使全党工作的重点得以顺利转移。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政改慢于、弱于并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改这一腿的过长与政改这一腿的过短,其间的巨大缝隙,恰是腐败迅速滋生蔓延的条件和土壤。

现在继续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纪检监察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30年来,经济转向市场化已基本完成,建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党委领导体制和纪检体制,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明显慢于并弱于政府的机构改革。历经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最近提出大部制改革,虽然还没有很好摆脱精简膨胀的循环问题,但相比之下,党委领导体制(包括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更慢于行政体制改革。

邓小平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8·18讲话”,所针对的不是管理、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顶层制度的改革。但此后20多年的政改,基本上都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了“8·18讲话”的实质性问题。

尽管改革可以暂时地回避实质性问题,但实质性问题却不会因为暂时回避而自动消失。

30年来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已经成为中纪委向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用词组。2002年11月,中纪委向十六大的工作报告中,为回答1997年9月中纪委向十五大的工作报告关于“力争在今后五年内使党政

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的承诺,对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第一次使用了“比较严峻”这个比较缓和的字样。但在此后不久的中纪委全会报告中,很快改回到“仍然严峻”的判断上。

宏观突破不了,微观也要见到成效

面对易发多发、不断滋生蔓延且仍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缺乏体制改革试点的支撑和宏观战略改革的可能的情况下,为不辱使命,只好采用不断加大斗争的强度、惩处的烈度、打击的力度来保持对腐败的相对高压态势。于是,人员不断增加,费用不断追加,机构不断扩编,级别不断提升,但期望的结果既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没有出现量的向好,30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总体结论和评价还是四个字:仍然严峻。

八年抗战,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后,最后取得胜利。30年反腐,我们在防御中相持。但是,是在相持中进攻,还是在相持中退却?似乎没有权威的说法。但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是:为何反腐败的形势,30年了依然是“仍然严峻”?

下面讲,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上面不同意;上面说,取得明显进展,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下面不赞成。于是,在认识反腐败的形势上,出现群众说现实的多,干部说道理的多;下面看问题的多,上面看成绩的多;专家讲体制弊端的多,领导讲技术改进的多。

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从宏观的体制制度层面上的突破,只好抓中观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层面铺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的面越来越广,纠风的事越来越细,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也越来越疲于奔命。于是,8小时内的监督困难,有的就转向抓8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

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

在目标的锁定存在不合理情况下,这种靠投入更多财力物力人力的高成本反腐方式,有如扬汤止沸,难以持续发展。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美国采用星球大战,就是用类似方式,让苏联最终在高成本的状况下难以持续耗下去。

反腐败不能再采用高投入高成本的方式了。不能只用加法,必须加减乘除并用。

预防腐败知易行难,关键在于党内分权

30年改革开放中的反腐败,从只重治标,到标本兼治;从重视办案,到源头治理;从惩防并举,到注重预防;从一个注重,到三个注重(注重预防、治本、制度建设)。

但是,预防腐败的工作怎么搞,始终还是未能破解的难题。各地各单位多着眼于教育和技术层面的预防。由于缺乏体制预防和制度预防的试验田,因此无法根据试验田的收成而及时提出“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

我们现在对火灾、疾病等公共灾害形成了以预防为主 的体制机制。但在反腐领域还形成不了一个“预防为主”的共识。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这方面体制制度改革试点的有力支撑。

既然上下的共识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工作就难以推进。预防腐败,不是依赖口号的提出就能做到,而必须依赖于体制制度改革的配套,才能真正落实。但遗憾的是,30年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特区深圳”,在纪检体制改革上,也缺乏类似的“小岗村”。没有特区的试点和比较成功的样板间,“注重预防”大多只能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而很难落实在行动上。“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则更难形成共识并结成果实。

古人尚知,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30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改革开放从党内分权起步的先河,我们应当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党内权力结构,

党内民主就能有存在的空间,党内民主就能有发展的时间,党内民主就能真正成为党的生命,健全的党内民主,就能真正并有效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民主也就能真正由党的生命成为社会主义的生命。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应当打破思维定式,走一条减法之路。也就是科学分解党内权力。

一说分权,几十年的习惯性的思维是怕弱化权威,习惯性的做法是头痛医头分事权。

既然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想出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奇招。殊不知,一把手凭借过分集中的权力,让更依附于他的人掌管人、财、物,效果远胜于他自己直接分管。

执政六十年,到了应该而且必须认真研究并实践党内机构分权的时候了。在保持中央和省委现有领导体制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在市、县委搞试点来探索经验,寻求从办案的思维转向监督的思维,从峻法转向预防,从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从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从事后转向事前。

当然,这种从扬汤止沸到釜底抽薪的转型是个痛苦的过程。但不走这步不行,想走这步,却不想改革体制制度也不行。

现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党委实行的是“议行合一”领导体制。马克思在 138 年前对 72 天巴黎公社“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赞扬,成了各执政的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经典模式,也成了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必然宿命,还成了改革中力图绕着走的雷区禁区。

其实,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是在战争压力下采用的权力结构,是其情有可原,其时很短的权宜之计。另外,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保证公社的成功。

前苏联照搬“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并由此而形成“苏联模式”。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也是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因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苏东剧变令人深思。

如果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可以发

现其权力结构设计颇有可取之处。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同时,也完备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皇帝拥有决策权,宰相郡守县令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权,同时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独立于行政官员的御史制度,并赋予其监督权。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封建社会比西欧早 500 年出现,晚 500 年灭亡,这长了差不多 1000 年的封建史,既得益于开西方文官制度先河的科举制,更得益于开西方三权分立先河的监察制。但现在很少有人研究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三权分立这笔历史遗产。

无论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还是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现在党委成为同级纪委难以监督的对象。之所以难以监督,是因为地方各级党委是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中于一体,而在这一体之中,又往往集中于被称为“一把手”的一个人。

尽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还没出现这个“一把手”称谓,但如果不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一把手”会凭借其越来越大的张力,而最终挤进中央的正式文件。于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演变成不再是一名普通成员的“班长”,进而再进化为凌驾于班子内所有成员的“一把手”。为了使这种凌驾能合理合法,个别地区的“一把手”通常还要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职务。

诚然,个别地区的“一把手”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头衔,在某种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非常态的现象,一旦常态化并固定下来,弊大于利则是必然。对个人而言,权力肯定会成为监督的死角禁区;对组织而言,党内民主肯定会受到削弱和重创。杜世成是如此,陈良宇也是这样。

另外,不知最初决定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头衔的领导者们,是否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研究并权衡过其加挂的利弊得失?

唐代统治者曾为这个小小的加挂头衔,付出过分裂为“五代十国”的惨痛代价。

在这一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执政时间越长,党委一把手权力集中的程度就越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越长,权力的含金量就越重;不仅会加大腐败的机率,而且会引发分裂的可能。其根源无不出自权力过分集中的“总

病根”。

改革开放前的“文革”十年浩劫,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总病根”的认识已经十分到位。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一“总病根”。

于是,小病慢慢酿成大病,违纪渐渐形成歪风,腐蚀逐步成为腐败。虽经组织部优中选优,并经党委、纪委严格把关的“一把手”,犯错误的比率居然高于一般普通党员和其他领导干部。通常占同级别犯错误党员领导干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超过百分之五十。

究其错误背后的原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地方党政各级一把手的集权程度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证明,没有科学的权力结构,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合理的权力分解,必然经常发生错误;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

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以健全。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容易腐败,而且也容易逃脱惩处。腐败一旦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保持一种“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态势,那么,就会在局部出现人心思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人中间发出为没有机会腐败的喟叹,就会在部分人中出现笑廉不笑贪的心态。

于是,称谓上,书记变成了老板,老板又变成了大爷。权力所内含的独占性、扩张性、排它性,在这“总病根”的催化下,对内形成强烈的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外先滋生跑官要官,再蔓延成买官卖官,最后发展成骗官杀官。

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党内的决策、执行两权必须分开

对于党内分权,半个世纪前的党的“八大”有过尝试。设立了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为主席,设立了党内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设立了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甚至从中央到地方还推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关于设立“党内国会”的构想及其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也很快就戛然而止。

至于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孰先孰后?80年代也是有过教训的。当时在党内还没有科学分权,党政还没有合理分工,党的肌体还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就仓促地提出党政分开,结果欲速而不达。

党内分权怎么才是科学合理,可向现代企业借鉴。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常常走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前面。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常由决策机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执行机关(总经理及各级经理人员)、监督机关(监事会)等三大部分组成。分工明确,制衡有效。

借鉴现代企业的权力结构,可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

首先,由该县的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内的三个委员会(党内原有的县处级职数可不必增加)。一是县委会(党内决策机关),由15—21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委书记是会议的召集人,也是县委会成员中唯一的县处级干部,但他的一票与其他委员的一票无异。因此,这时的县委书记,也就真正具备了兼任县人大主任的基本条件。二是执委会(党内执行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首长负责制,由现任的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执委会书记,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三是监委会(党内监察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纪委书记改称监委会书记。

其次,党代会闭会期间,由县委会代行其职权,县执委会和县监委会向县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最后,县监委可以对党内专门的执行机关——县执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同样县执委也可对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县监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制衡。

综上,在县级党委进行改革党内权力结构的试点,既符合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在市县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要求,也遵循了分

权制衡的原则,还能有效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通过党内科学分权,逐步实现党政合理分工,再到完成党政分开。这分权、分工、分开的过程,既是有效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切实恢复党员主体地位的过程,还是从战略层面上真正实现预防和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过程。

精通平仄未必能写出好诗,因为好诗的功夫在诗外。

诚然,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查办案件。但是,中国未来反腐战略的取胜之道,大约也应当在查办案件之外吧。

(责任编辑 李 晨)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李 锐	29.50	7.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党史札记末编	龚育之	32.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潜规则》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秘密。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胡乔木、周扬、丁玲、夏衍、胡风等文化思想界名人六十多封信札,述及 1949 年到 80 年代文化思想界的大事。解读这些信件,成为重读文化思想界风云的新视角。

《走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直言》尝忆 50 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 80 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

——李锐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

• 蒋燕燕

近两年，李慎之叔叔的子女在收集整理他们父亲未发表过的文章，包括李慎之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我的朋友李尔柔（李慎之的女儿）把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李叔叔揭发我母亲郑德芳的交代材料寄给了我。

材料一共有四篇，第一篇：《关于我同郑德芳的关系中我错误言论的交代》（时间不详，从内容看写在1962年之后，文革之前）；第二篇：《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8日）；第三篇：《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10日）；第四篇：《关于郑德芳》，文中有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给李慎之的函，还附了李慎之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和1978年11月30日回复对外部的材料。

我母亲和李叔叔很早就认识，1946年同在延安新华社工作；1949年到北京，我母亲在新华社对外部，李叔叔在国际部，都是主管业务的副主任；1957年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他们既是多年的同事又是老朋友。这些材料部分再现了当时两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言论和思想，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我引用其中一部分，展现给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也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斯大林问题

关于斯大林问题，李叔叔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主要有三点：

1、关于斯大林。她对斯大林是十分反感的，同我一样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对三七开感到难以同意。

2、关于“民主”。她认为俄国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要求什么权利，斯大林问题与此有关。她认为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她认为英美的民主不能认为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它是人民争来的，因此是真实的。最后这句话给了我以影响。这个提法使我确认我们所说的“假民主”之间还是有着“真民主”的成份的。

3、关于新闻自由。她和我一样，认为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有些“愚民政策”（我当时用这个说法是听吴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此看法）。

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在对我母亲右派问题甄别平反时，曾向李叔叔进行调查核实，30日李慎之回复了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的函》，其中与斯大林有关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二、如我的材料所写，郑德芳确曾说过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愚民政策”的话。反右斗争中，仅仅这四个字，就可以构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当时曾希望，在新华社这四个字还可以得到谅解，因此我在括号中注明：“我当时用这个说法的来源是听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在这里说得很模糊，我所不敢直说的是，这话实际上是吴冷西传达的毛主席的话，像郑德芳和我这样副主任一级以上的干部应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曾多年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主席讲的话，一个普通党员讲了，就能被划为右派分子。

三、斯大林是“暴君”一类的话，当时是很流行的。为是为非，不妨让历史去证明。当时根据吴冷西传达，胡乔木同志曾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残暴，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最黑暗残暴的时代，毛主席日思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话传达范围，不止到部主任一级，新华社现在还有人保存得有当时的记录。我没有听郑德芳讲过什么“中国是君主专制”的话，不过，她曾有一次在扩大编委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是 en-



1965 年的李慎之(李三达提供)

lightened despotism 就是开明专制”。这是全场十几名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听到的，不知因何转辗相传成了“君主专制”。开明专制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绝对君主制转到立宪君主制过程中的一段时期，在几个有名的开明君主统治下，曾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兴盛。当时，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现在是训政（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 年第 11 期）时期”。我看不出郑德芳的话同毛主席的话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次扩大编委会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大概是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吧！1957 年，总理曾亲自同我们谈过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之深。我当时水平低，理解不深，现在才看到这种传统为害之烈。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知道马、恩、列、斯、毛是并列的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受到的教育，还是看书看电影，都宣传斯大林是苏联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我很敬仰斯大林，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他和列宁领导

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列宁去世后，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苏联军队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在文革中，我曾看过几本“禁书”，其中有涉及到斯大林在国内进行“大清洗”的文章。当时我看这些书是有戒心的，觉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在有意诋毁斯大林，不一定真实。直到文革以后，我看到有关的书和材料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转变，对伟人不再迷信了，才逐渐接受了那些残酷的

史实。

从李叔叔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重要依据：同意中央确定的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的，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划成右派。

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伟人，有了“三七开”的评价，就可以不再追究他的错误了？无论是三分错误还是七分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对错误难道不需要批判和肃清吗？何况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更多地了解斯大林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翻阅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查看了其它有关材料：

1955 年底在苏共二十大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由赫鲁晓夫提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通过调查，“准确了解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

以百万计的被捕的人,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这个委员会通过调查,查阅文件,“把许多人(包括被捕者和那些进行审讯和逮捕的人)叫来进行审问,查看了据以将人们关进监狱、流放和处死的材料”。调查完成后,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在1937年至1938年间,被控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人民敌人”被逮捕的有数以百万人,其中几十万人被枪杀!报告的结论是:“我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滥用权力的行为。斯大林所干的事情,是我们任何人也想不到和推测不到的。”(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年2月25日上午,由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

以下摘录秘密报告中的一些段落: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主要的和实际上惟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向被告采用肉刑而获得的。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年——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按照制造假案的侦察员的口述)给自己加上了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即占70%。

报告中列举了许多斯大林大清洗的实例,例如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严刑拷打,搞“逼供信”;处决已宣判无罪的人,制造“医生谋杀案”,迫害奥尔忠尼启则一家及基洛夫被暗杀的种种疑点等等,以证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我想,如果当时看过或听说过这个秘密报告内容的人,是不能不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

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对苏共

二十大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在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讲话: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党中央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个人崇拜,只是“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但其后的结果是“八大”之后,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推向了顶峰。

“八大”结束几个月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的“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菟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

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

紧接着,反右斗争就在1957年的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开始了。反右斗争最终造成55万甚至更多的人被划为右派(据中共中央公布资料,1957年——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成‘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而改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却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有人说纠缠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向前看,目前改革开放,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社会和谐首先是人心和谐。我们翻看历史,批判错误,是为了不要让历史的错误重演。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更应从思想、理论、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中彻底肃清反右、文革以及类似运动中遗留的毒素。否则当气候条件成熟,个人崇拜盛行,个人的权力大于民意的时候,这样的错误还会重犯。目前某些政府部门、某些执政者、某些工作中,不是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着侵犯民权,权大于法的错误吗?

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科学正确地看待历史,科学、公正、公平、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以某人伟大而掩盖他的错误,也不因某人犯过错误而掩盖他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贡献,不篡改历史,不掩饰真相,求实求真,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期间母亲和李叔叔很少见面,在这种非常时期,两个摘帽右派碰头聊天是自找麻烦。但两个

人还会偶尔碰到,就一起“speculation”(猜测)和议论对文革的看法。李叔叔在交待材料上说:“因为被揪出,被冲击,内心抵触甚大,平常逆来顺受,没有发泄的机会,碰到郑德芳就大发其反动谬论。”

从李慎之1969年4月8日的《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和10日《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的两份交代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从几个方面提出的看法,综合两份材料引用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人的运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问她(郑德芳),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 whole generation of china’s leftists to be wiped 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记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19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 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

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根据当时已公开公布的材料,彭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状是他说“错误人人有份”,文化大革命会搞成“一场混战”。……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看,确也是有点“错误人人有份”的样子,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差不多都出了问题。我很难相信这些人都是反毛主席的。至于说“一场大混战”,我当时就认为已经出现……

郑德芳常常说:“现在一点 tolerance (容忍)都没有”。我是完全有同感的。……一个人只要说错几句话,被揪出来就是三反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定罪的。我说,孟德斯鸠在两百年以前就说思想不能定罪,这是我认为应该绝对遵守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导致我不断犯罪的深藏内心的最顽固的思想堡垒之一。)我记得,我曾对郑德芳说过:“Thought crime”(思想罪)这个恶毒的词。

我曾对郑德芳说过:“鲁迅曾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我套用他的话说一句‘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亡’。”我说:“1957年以前,毛主席并没有提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还比较好,敌我矛盾也处理得很宽大。1957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一上来就抓出了一大批右派,都是敌我矛盾,现在更是一碰都是反革命,敌我矛盾越来越多。”……事实上,我当时也确实估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不知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反革命来。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



郑德芳(1956年)

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

1967年的时候,我把形势看得很糟。我一直担心“收不了口”。我根本不懂得江青同志所说的“乱是乱敌人”,“乱了才有治”。我只看到各级领导班子解体,权力中心瘫痪。我曾经对郑德芳说过:“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一个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将来怎么收口?”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换接班人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反动的话:“英雄难过个人关”,诬蔑毛主席为了防止刘少奇将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而把文章做大了,对国家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师”之中,是有人不大“服”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

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以后,特别在1967年初的夺权以后,我以为毛主席不但要“换继承人”,而且要“换党”。

三、对“造反派”的看法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我当时看到地方上常有军队参加武斗,心里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藩镇之乱”。

在1967年的时候,戚本禹曾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过:“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是对的,不如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我一方面讽刺戚本禹真不愧为最大胆的“青年历史学家”,一方面认为他的话完全是谬论,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秦始皇的政权并没有巩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秦朝本身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时代,到了汉朝,儒生又吃得开了。我认为戚本禹的话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公然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焚书坑儒”。我认为如果如此,那是达不到目的的。要

巩固政权还得加强经济基础。历来造反的不见得就是读书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捣乱最厉害的也并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洪振海那类人。

四、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当时还是文革初期,李慎之和郑德芳都不曾预料,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年,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无法计算的破坏和灾难。)

五、关于文革中破旧立新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 can 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学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我把当时的批判看成只是“破”,看不到“立”。心里想,“破”是可以,将来“立”什么。我有时还觉得自己很真心诚意地想,究竟能立出什么样新的东西来。想来想去想不出,就认为许多东西,将来还得“复旧”。认为破来破去,只是打倒了一批老当权派。我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我不能想象将来怎样“立新”的东西,所进行的批判就说不服我。……我记得我曾向郑德芳说过:“报上批判复课不要复旧,但是不复旧怎样复课?”

六、文革对国际关系影响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

……我对国际形势有反动的看法,认为中国孤立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初被认为是“革命行动”,我则自始就认为是“破坏行动”……我说,总理过去总是强调要多交朋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费尽心力,打开一个局面,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很好,国际地位很高,现在强调要反对帝修反,毕竟也不能树敌太多。要反也只能一个一个地反,不能一起反。我确实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孤立的危险。我认为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革命派”中肯定有最危险阴险的阶级敌人……

关于越南,我曾对郑德芳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把胡老头和他底下的人吓得向右了。他们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国内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他们要是知道连韦国清这样的人都要挨打,他们还敢向中国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吗?

以上主要汇总了李慎之的交待材料中所涉及的六个方面问题,在他的交待材料中还有许多其他对文革的真知灼见,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这两份材料仅反映了从1966年至1967年的情况,整整十年的动乱,“大戏”还在后面,争权夺利的“九大”、“9·13”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场由领袖导演,一群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表演,全国人民遭殃的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大戏”,最终以“四人帮”倒台落幕。

1969年以后,我母亲和李叔叔都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作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上了干校,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一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母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新华社组织部把她的档案中的交代材料都还给了她,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往事不堪回首,母亲把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她没有想到,这同时也销毁了她对那段历史的记录。

感谢李叔叔,他比我母亲有远见,没有像我母亲那样销毁了这些材料,他为我们这些后人保留了那段时期的记录,现在看来尤为珍贵。这些

记录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再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还有些更深刻的东西李叔叔没有写,那是为了保护我母亲。用李叔叔的话说:“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郑德芳)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的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其实就眼前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带着罪名,受着批判,还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当年的交待材料,是对我母亲和李叔叔最好的诠释,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敬佩和理解。

母亲常说她也属于“两头求真”的人,年轻时为寻求真理,寻求民主自由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了晚年还在寻求真理,关注着民生、民权、民意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些材料我们得知,就是在他们被批挨整的中年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其中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他们言中了,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灾难。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常想: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说,言论无罪;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想,思想无罪;什么时候言论、思想无派别之分;什么时候不同的言论、思想之间,不再视同仇敌,那时国家才会有自信,人民才会有尊严,社会才会有进步,才会有真正的统一与和谐。

我以此文纪念已逝去的母亲郑德芳和李慎之叔叔。

(作者系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工程师,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

• 严迎春

关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论者甚众,以笔者之见,陈氏晚年最为强调的就是民主的普适性及资产阶级民主对社会主义的继承价值。当此普世价值争论激烈之际,回顾陈独秀对民主的思考,自不无意义。

一、民主的概念和类型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这是了解陈独秀的民主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民主是什么?陈独秀在早年(五四时期)和晚期,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即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不过,与早年相比,晚年陈独秀更为强调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制度的继承性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陈独秀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日、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继续存在。不同的只是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和具体。

关于民主制度的继承性。陈独秀先后提到了大众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近代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英美民主等几种类型。在《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中,他还将有史以来的民主制列表如下:

- 1、上古世界:氏族社会民主制;
- 2、古代世界(希腊罗马):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 3、近代世界: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
- 4、法西斯蒂专制;
- 5、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 6、未来世界。

无论论及哪一种类型,陈独秀主要着眼点都在其具体制度上。他多次具体阐发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精神、制度和意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的基本价值,有着很强的继承性和普适性,无产阶级民主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基本民主制度建设上乏善可陈,违背了民主制的基本精神,成为他晚年重点批评的对象。

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

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悠久、最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考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与许多论者不同的是,陈独秀很重视对资产阶级民主具体制度的研究。在《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0日)中,他明确概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为如下七条:“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

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信仰自由。”在《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中,陈独秀又再次概括资产阶级“民主之基本内容”为以下三条:“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还将英美民主制的内容概括为如下五条:“(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纲领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基本制度的研究影响很大。台湾著名民主人士雷震认为,“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

陈独秀认为,作为人类几个世纪奋斗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有着人民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因此,它不但为资产阶级所欢迎,也是无产阶级所乐意拥有的,而且无产阶级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惠。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绝对不应该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这实际就否定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继承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应该支持英美等民主国家反抗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认为这是为保卫人类的民主成果而战;反对英美国内的工人阶级进行反战的运动,认为这只会帮助希特勒等法西斯势力,将使人类回复到黑暗的中世纪。当然,也是从上述观点出发,他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原则,甚至称之为“反动堡垒”。

三、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社会主义是陈独秀毕生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不同,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有何重要性,陈独秀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思考。

一是民主的重要性。

陈独秀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光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指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因此,陈独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二是民主的继承性。

陈独秀认为,就基本内容来说,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没有什么分别。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中,陈独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此前,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在民主的基本内容上(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无不同。如果有,也只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更广泛一些。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就是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陈独秀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内容,应该全盘吸收。他坚决反对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而以空洞的民主口号代替切实的民主制度。

他还认为,传统无产阶级政权学说在制度上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但将其改造为“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以为这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陈独秀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陈并认为:“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这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

民主的异同问题。

三是剖析苏联制度。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十分重视对其民主实践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更多受到了托洛茨基等的影响。在《给西流的信》中,他将苏联的现行制度与前述英美民主制分项列表比较,认为苏联和斯大林明显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1)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2)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3)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4)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5)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他甚至将苏联和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老师。

但他认为,苏联目前的问题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这就又回到了他一再强调的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继承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上。

他认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正是因为“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指无产阶级专政)抬到天上,把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才产生了斯大林。“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

他认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因此,陈独秀认为苏联和德国、意大利一样,是“三个反动堡垒”,他们“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但随

后他又支持苏联反抗德意志的战争。认为二者比较,还是前者胜利对民主更为有利一些。

四、民主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

综上所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五四”,重新肯定了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并深刻阐发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和继承性。胡适在1949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的“序言”中,认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二是以苏联为对象,深刻反思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陈独秀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更是可取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见解,既是针对以苏俄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而发的。

当然,陈独秀并未形成完备的民主政治观,比如:民主政治固然应当照顾多数,但也应当尊重少数,权力必须相互制约,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宪法之上,原告不能做审判官;民主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在具体国家和历史背景下也会有自己的特点等。对于中国传统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也缺乏应有的探讨。这些无疑都是需要我们后人认真去补充的。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白求恩：孤独的异邦人

• 林贤治

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不知道白求恩的名字的。在规定“天天读”的著名的“老三篇”中，这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圣徒，众人学习的典范。但是，作为西方知识分子，白求恩身上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特质被掩蔽了。应当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与革命理想是有密切联系的，然而也有冲突，并因此蒙上悲剧性的阴影。

白求恩 1938 年离开温哥华前往中国，据介绍，与他同一位他昵称“小种马”的女友、左派艺术家玛丽安·斯科特的恋情有关。不过，从他动身时写给斯科特的短简看，当时肯定受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长征》、伯特伦的《中国第一幕》一类书籍的诱惑，毕竟他是一个富于政治激情的人。此前，曾经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负责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英国作家奥威尔一样，由于政治身份遭到西班牙当局的怀疑，行动受到监控，结果提前被召回国。从此，奥威尔脱离了实际斗争，致力于写作反面乌托邦作品。而白求恩，对于革命，依然充满着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的热情，而且勇于孤身前往。

在延安，外国专家很少。白求恩的到来理应受到当局的礼遇，仅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便相当可观。然而他谢绝了。

以下是他写给“军事指挥部聂将军处”的相关的信：

亲爱的同志：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林大夫带给我的 301 元钱。这笔钱中的 100 元好像是付给我的个人津贴，另外的 102.20 元似乎是用来偿还我在药品上的垫支，而剩下的 98.80 元似乎是用来支付我在纱布和药棉上的开销。关于这第一项 100 元，我在 8 月 12 日发给延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已经表示过拒绝接受并且建议将它用做伤员们的烟草专款。我在此只想重复这一提议。关于其他



白求恩(1890—1939)

的两项，首先，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药品上垫付过那笔钱；至于花在纱布和药棉上的 98.80 元钱中，只有 70 元是经我的手花出的，剩下的部分则是由布朗大夫支付的。我经手的这笔钱在 6 月 6 日离开岚县前往五台之前已经由蒋大夫给过我，所以它并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八路军医疗队的。这笔钱的收条早已经寄给延安的首长了。

其它的医生每月只有 1 元的津贴，而聂将军本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可观的”5 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接收每月 100 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因为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的，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致同志似的敬礼！

白求恩

这种对金钱的态度，令人想起中国的另一位革命者的名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而今，一代



白求恩在做手术

古典共产主义者随风远去，难寻踪迹，令人唏嘘。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白求恩随部队辗转于荒凉的大西北，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用他的话说，过的完全是“高强度的生活”。他在1939年8月15日写了两封信，一生中最后的两封长信。其中一封给加拿大的党组织，另一封给一位未明身份的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同志”。在私人通信里，他偶尔述及1938年一年，其实不到一年的工作量：“去年我共行军3165英里，其中有400英里是徒步穿行于山西、陕西和河北三省。我共做了762个手术，检查了1200名伤员。我还重组了部队的卫生系统，写作和翻译了三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如此繁重的工作，卓著的效绩，不要说一个人，就算一个小分队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像这样一个忘我工作，毫不讲究物质生活，从不计较个人酬劳，却又拥有一门专长技术可资利用的人，怎能不受革命的欢迎呢？

白求恩在信中坦陈道：“我不在乎日常的艰苦——酷热和严寒，肮脏和虱子，一成不变的食物，崎岖的山路，没有火炉，没有床铺，没有澡堂。”是的，他可以放弃为大众所追求的优裕的生活，忍受肉体所能担受的一切困苦；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需要的只是一种有信仰，有内在方向感的精神生活。其实，他一直在谛听灵魂深处那个古老的声音——自由的呼唤，而且期

待着身外热烈的回响。真实的境况恰恰是：精神比物质更匮乏。

白求恩是一个技术知识分子，难得喜欢文艺，一生热爱写作。多伦多大学出版他的文集《激情的政治》（1998），其中除了医学论文，还有诗、小说和戏剧，间有摄影和美术作品。此外，就是大量的书信。看来，文字被他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来华以后，他每月都给毛泽东和加拿大党组织写工作汇报，频频地给各地的朋友写信。意想不到的，邮件极不规律，发出的信几乎没有回音。他开始抱怨。1938年底，他写信给马海德说：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经习惯了！向上帝保证，我已经习惯了。又有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你的回信。延安的医疗队于11月25日到了这里，却没有带来信件。我一直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带给我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一封你的信，让我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但是，他们却只带来一台没有电机和支架，所以将无法工作的X光机。他们还带给我一听已经开封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我宁愿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顺便说一句，我从延安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开封。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还有缺页。下次请一定将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层保护。中国人的好奇心太强了。

除了一张日本人留在一座小林子里的4月18日的《日本宣传报》，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英文报纸了。我也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如果不是因为一天中有18个小时要忙于工作，我肯定会有不满情绪的。

白求恩在次年的信里，也说：“没有回信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不情愿接受却越来越能够接受它。”他估计收到的信件只有1/25，至于书和杂志的情况更糟，一年半的时间也收不到一本。他说：“我完全清楚有钱人的时髦和好莱坞的新招，但是对于所有重要的事情，我知道得比北极的探险者都少。”他总结道：“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孤身一人——没有信件，没有书籍，没有杂志，没有收音机。我必须借助帮助才能够支撑下去。”

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比“王土”广大得多。他

关心人类,关心千万里外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大小的变动都与他有关。他努力捕捉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他渴望了解。同时,他也希望世界了解他,理解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士人为了寻找“知己”,不惜捐弃生命。对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可托的知己就是组织,这组织在他的心目中是千百万生命个体的集合,是扩大了有血有肉的躯体,总之,是充分人性化了的。所以,他渴望与组织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流,如同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事实上,组织这东西,在其自然倾向来说,无疑带有整体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性质,出现程式化、官僚化、甚至非人化的现象不足为怪。组织要求其中的每个分子无条件服从,做“齿轮和螺丝钉”,但知识分子不能。他要在组织内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无论何时,维护个人的尊严甚于生命。

白求恩生活在别处,却不满于“完全与世隔绝”。他收不到加拿大共产党的信,也收不到中共方面的信,这种来自组织的显得相当冷漠、简慢的态度,特别使他受伤。他在14个月内给原来的党组织发出20封长信,完全石沉大海。他给毛泽东个人寄的“许多信”,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还不知收到没有”。失望之下,他也就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他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Trustee Committee)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再给他们写信了。”

1938年豪情万丈,一年后急转直下,陷入低谷;不快,厌倦,悲观的情绪积聚起来,完全控制了他。根据薛忆沩先生的介绍,《激情的政治》将白求恩在华时期的文字分成两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的人。到了后来,他变得实在无力抵抗“乡愁的袭击”了。在最后的信中,他把返回加拿大的决定告诉了组织和朋友,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梦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品的幻影!书籍——书还在被写出来吗?音乐还在被演奏吗?你还在跳舞、喝啤酒和看电影吗?铺在松软床上的干净的白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还喜欢被人爱吗?

所有这一切在我境况好的时候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这多么令人伤心!

他毫不隐瞒他的思乡病,那被革命理想压抑已久的世俗生活的欲望:他想家,想电影、音乐、跳舞、咖啡、啤酒,想女人……在这里用得上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知识分子时的一个经典说法,就是: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倘若把白求恩梦想中的生活方式同现实中的“清教徒”形象联系起来,不免显得有点荒诞不经。其实,直到他做出暂时离开延安“回家”的计划时,也仍然在周密地考虑在短暂的旅途中如何继续为中国革命工作,比如募集资金和物资,甚至医疗人员等等。革命者要战斗,也要休息,要娱乐,要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我们知道,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但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要求。一本书,一份杂志,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对于延安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区域来说却是简直近于奢侈的;况且,革命战争需要的是工具和武器,军事化准军事化行动本身便带着一种整齐性、强制性和精简性,命令、指示、集体决议和纪律才是唯一重要的,至于个人友谊、欲望、感情、志趣之类,不用说是多余的赘物,甚至于是消极有害的。与此相反,在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看来,所有这一切是如此必需,又如此平常。卢森堡向往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的志同道合的结合。这样的革命是否能够成功是一个问题,但是它颇适合于知识分子的胃口是的确的。问题是,有形形色色的革命:或者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如卢森堡说的“畸形的革命”。他们渴望参与其中,在组织内部,却又要求从形式到实质,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与自由。倘若革命不是以一种尽可能民主的、温和的形式进行,拒绝“请客吃饭”,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便变得不可避免了。鲁迅演讲的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扩大一点说,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歧途。

革命是不是可以融入更多一点人道的、人性的元素?在延安,“人类之爱”是受到公开批判的。萧军的杂文《同志的“爱”与“耐”》成了毒草,王实味也因为《野百合花》等有数几篇文章,惹来杀身之祸。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事件,发生在1942年整风时期。而这时,白求恩因为手术感染,怀着“回家”的梦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三年了!

从白求恩去世的最后一年的(下转第64页)

范长江言论自由

● 王咏梅

早期对言论自由的阐述

范长江较早论及言论自由的文字,是在他发表于1937年4月的通讯《忆西蒙》中。他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报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注1}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年代,特别是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范长江在包括《祖国十年》^{注2}在内的一些通讯中陆续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于友在分析范长江早年热衷于宣扬民主理念的原因时,说:“由于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注3}。于友没有提到的是,1937年初范长江的延安之行导致了他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2月9日晚,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介绍了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以及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注4}此后,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自此,范长江有了“正确的认识”,报道的政治倾向也逐渐有利于中共 and 红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然也就离不开对民主、自由的阐发。

这时,范长江还在《大公报》工作。《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和大

胆放手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的爱国热忱和远见卓识,为范长江充分实现自己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条件。他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年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报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1937年“七七”前后,范长江负责战地记者的派遣与联络工作,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为1938年主编或与人合编出版大量的战地通讯集创造了条件。长江说:“这两年(指1937年、1938年,笔者注)写的战地通讯,随笔等,是我作记者的历史中最多的。”

又说：“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关于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范长江在1941年为香港《华商报》写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留下的问题”一节中更为详细地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注5}

傅国涌认为：“这番回忆生动地印证了《大公报》坚持‘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选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青年范长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笔调写出真实的中国一角，从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范长江在新闻界的崛起与《大公报》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胡政之语）是分不开的。”^{注6}

但1938年秋，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以反对中共提出的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以坚持抗战的方针。范长江主张党派民主团结，在这个问题上与拥护“三个一”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生矛盾。长江回忆说：“张季鸾随即和我正式谈判。他第一次对我明确表示：‘《大公报》要完全以蒋先生的意见为意见。’我说：‘《大公报》应以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他说：‘你是《大公报》的人，你应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应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和《大公报》在政治上就因此闹翻了。”^{注7}最后，范长江离开了《大公报》。

系统论述言论自由



毛泽东与范长江

范长江系统论述言论自由，是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这是1946年春范长江在他所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话。他说道：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就是“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并认为：言论自由“一定在反动派统治的社会里，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革命地区，人民革命已经成功的地区，言论自由的问题已不成问题。因为言论自由这个口号，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提出来的口号，一定是那个地方言论不自由，才提出这个口号。”

在范长江的心目中，言论自由最终目的是批评政府，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他之所以认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言论自由不成问题，是基于“我们到国民党地区办报，最头痛的是新闻检查。在我们这里，不但不检查，我们还可以批评政府，而且不止一次地批评。政府不但不能光火，而且要老老实实地道歉”的事实。那时解放区民主政府对待批评言论的态度，与国民党政府迥然不同，范长江举例说：“上次批评淮安县委住的房子太好，脱离群众，只好老老实实搬家”，他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以在我们这里，言论自由是不成问题的，民主政府给我们充分自由，从来没有限制。在国民党地区，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在报上发表正确消息与正确言论。”^{注8}

范长江在这里对言论自由所发表的态度，有

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虽暗作反共内战准备,但在口头上还不得不高唱和平调子,玩弄“和谈”阴谋。国统区新闻界发起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以1945年8、9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声势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揭破了国民党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种种造谣污蔑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运动的序幕。此后,重庆16家杂志社发表了拒检声明,并得到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上海等地文化界、新闻界的支持与响应。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不得不明确“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但是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其一贯奉行的新闻统制政策。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暗中仍在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新闻言论自由。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做出具体规定。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还在会场外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对要求民主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大打出手。就连胡政之也说:“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注9}

在整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45年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

《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并发表社论高度赞扬拒检运动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民主运动”,明确指出不合理的法律规章“都是应该立即废除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10月1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指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首先,检查制度在大后方是废止了,收复区还在继续;其次,报刊杂志的创刊,须经登记核准,这一制度还没有废止;再其次,这是很重要很迫切的,邮电检查制度也还没有废止。”因此,社论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新华日报》还就“校场口事件”、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与《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大公报》等展开多次正面交锋。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注10}这时,范长江对言论自由作出系统阐述,正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一种有力回应。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既是共产党的态度,也反映了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声。

1938年10月范长江宣布脱离《大公报》后,不仅发起创办了“没有资本家”的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参与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还于1942年进入中共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并于当年10月任中共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1945年12月又在江苏淮阴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可以说,范长江有着在国共统治区新闻界工作的丰富经历,两相对照,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争取言论自由的迫切。长江回忆说:“记得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

那时我在桂林办‘国新社’，房子里开会，门外特务完全可以听见。白天晚上特务不断，讲什么话都可以听见。他们带着枪，我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像勤务兵一样。那些新闻检查官，专门吃喝嫖赌，既无文化又无知识，我们辛苦送去的稿件，他们读不懂，还要检查我们的稿子，决定哪些可以登，哪些不可以登。有个家伙，曾经到我们新闻机关来投考而考不及格，跑东跑西，跑到新闻检查所去了，反而来检查我们的稿子。被他们删掉的地方，我们加一个‘略’字也不行。有时为了通过一篇稿子，要跑到新闻检查所去同他们打招呼。曾经过这种日子的人，现在来到解放区过自由日子，就是没有房子，就是多跑路，无论如何也是高兴的。有充分言论自由，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好像饿肚子的人，一旦吃到很好的饭菜，说不出的有味道。所以新闻自由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要突破一切困难，要求言论自由。”

范长江不仅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报纸的生命。没有言论自由，报纸就没有生命”，还考虑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艰难性，认为“在反动派统治地区，一定要坚决地要求言论自由，不惜牺牲一切去争取言论自由”。身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介的高级领导，范长江认为：言论自由应该是“真理的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应该有真理自由，这是人民正当的要求，正当的主张，正当的意见，要有发表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范长江心目中，“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有原则的，必须是真理，人民的”。反动派的言论、封建的言论不能有造谣欺骗的自由，如抗战胜利后，鼓吹独裁、反人民、反民主的新闻，就不能有自由；国民党的报纸如果遵守人民的基本真理，不反对民主，符合人民要求，也可以在解放区办。总之，“在民主时代，主张民主的，才有言论自由；反对民主的，就不应该自由。”范长江认为应该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统区取消新闻检查的时机，在国统区办报，“争取言论自由，把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言论讲出去”；而在解放区，没有新闻检查，报社工作人员应当更加自觉地加强责任心，“随时随地十分注意看稿件是不是符合人民利益”，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要十分注意人民的利益。”他还说：“必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必须同旧社会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一致。

所以对内的自我批评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对敌保持战斗性，对内就是自我批评。”^{注11} 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显然与密尔顿和弥尔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是不同的。

于友认为：“在中共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要求舆论一律，更由于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注12} 但这种思想的形成，有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范长江还谈到了“党报与人民报纸的统一”、“报纸的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性”、“真实性”等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会有超阶级的自由，不属这个阶级，就属那个阶级。”“我们对旧的统治者，反对新闻检查，要自由；在革命队伍里，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如果要自由，就会脱离党，脱离人民。”^{注13} 很明显，范长江认为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除了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以外，就没有了别的自由，因此演变到后来成为“驯服的党政干部”，也就不奇怪了。

提倡说真话、走群众路线

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上先后发生了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整风运动中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引蛇出洞”的工具，新闻界自身也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还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大放卫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更是传媒宣传的重点。

自1946年发表《论人民的报纸》后，范长江担任过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等职务，解放后还曾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一直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但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就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不过，范长江没有停止他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注14}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于友把这件事,当作范长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的一个证据^{注 15},认为:“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注 15}的确,关于什么是真理、真话,有着不少的哲学讨论,但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言人自己认为是真理、真话的内容。据曾经跟随范长江14年的司机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范长江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十分气愤,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司机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范长江回答:“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注 17}这就是范长江所说的“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从中可见范长江坚持说真话的铮铮铁骨,也可见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能为实现言论自由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两年后的1961年,范长江还写下《记者工作随想》,大胆地就自己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见解:“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

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数,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在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作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的时候,在林彪等人通过报纸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在有的人成了进行口诛笔伐的斗士,有的人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专家,新闻事业内部矛盾人为地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在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洗礼”,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的时候,在多数新闻工作者违背基本的新闻规律,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代替真实的事实报道的时候,在很多新闻学研究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甚至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捍卫者的时候,范长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回顾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论述和实践,可以发现:他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太一致的主张,但贯穿始终、经久不变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从主张“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到因为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离开《大公报》;从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谈到的“依照人民的意志,什么自由都有”,到这里提出的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已遭到陷害的时候,他还坚持尊重群众的意见。1966年6月,范长江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大字报到处都是,他还要去科委。司机说:“你别去,那儿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范长江却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注 18}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被宣布停止职务。他在60年代公开发表的几十首诗词都被说成是“黑诗”。他在30年代报章上写下的数百万字新闻作品,更很快成为他百口莫辩的“罪证”。他最初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甚至主动将历史材料送到审查者手里,于是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数十本日记、笔记等都交上去。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连载长文《祖国十年》,因日

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他。文革开始后范长江重新翻阅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行文,心里担心容易引起他人“误会”,曾想“烧了算了”,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将保存了十多年的文稿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他没有想到,他提交的这些材料都反过来加重了自己的“罪名”。

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说:“父亲的一生主要做过两件事:一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当记者并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二是在建设时期主持科协工作,倡导推动新时代的科学文明。他前后从事的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一致的联系——崇尚理性和客观性,尊重事实,恪守责任,追求真理。也许是这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天生豪爽直率的性格,他无法忍受那些戴着政治光环却十分龌龊低级的污蔑与谎言。虽然他有‘坦白从严’的教训,他仍然决定坦荡而真实地写出自己过去曲折漫长的生活经历,并公之于众。他拿出确凿的历史证据——保留多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证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当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的。我们当时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开始相信父亲是受了冤枉的。我们几个孩子帮助父亲将他的自述抄成洋洋万言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也许,在当时那种疯狂的环境气氛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识时务——那样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公开辩护。”^{注19}这时的范长江,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和知识分子,在以公开的答辩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维护包括说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话在内的各种正当的基本人身权利。

“文革”中范长江遭遇到严重迫害,经长期关押,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在1970年冬含冤而亡。

注释:

注1 范长江:《忆西蒙》,《大公报》1937年4月20日。

注2 《祖国十年》发表于《华商报》1941年9月至11月。

注3 于友:《解读范长江》,群言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63页。

注4 范长江:《我的青年时代》,《人物》(丛刊)1980年第3辑。

注5 以上分别引自《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8-1189、984页。

注6 傅国涌:《范长江的悲剧》,《二闲堂文库》,2003年3月16日。

注7 范长江:《我的自述》,《范长江新闻文集》。

注8 以上引自范长江:《人民日报的基本问题》,《范长江新闻文集》,第1030页。1946年春天,范长江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时给学生讲过课,题目是“论人民的报纸”。1989年,节选该文的第三部分,冠以“人民日报的基本问题”,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

注9 胡政之:《在上海馆编辑部会上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5期,1947年7月5日。

注10 以上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94-301页。

注11 以上引自范长江:《人民日报的基本问题》,《范长江新闻文集》。

注12 于友:《解读范长江》,第64页。

注13 以上引自范长江:《人民日报的基本问题》,《范长江新闻文集》。

注14 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了党内的民主作风问题。

注15 于友:《解读范长江》,第64、65页。

注16 同上,第63页。

注17 卜永麟:《我给范长江当司机》,《不尽长江滚滚来》,群言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294页。

注18 卜永麟:《我给范长江当司机》,《不尽长江滚滚来》,第294页。

注19 以上引自范东生:《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纪念父亲范长江诞辰九十五周年》,《不尽长江滚滚来》,第370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李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大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晏阳初与卢作孚

● 苟翠屏

晏阳初和卢作孚是 20 世纪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 1938 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 50 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与梁漱溟一道并称为“乡建三杰”。思想上的相通，人格上的相敬，作风上的相似，使晏阳初和卢作孚不仅成为事业上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而且成为终身不渝的至友。

—

晏阳初与卢作孚都是四川人。晏阳初，1890 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受传教士的影响，谙习时势的父亲在晏阳初 13 岁时就把他送到几百里之外的保宁府（今阆中县）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接受新学，从此踏上了在他乡异国的艰难求学之路。1916 年，晏阳初远涉重洋，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习政治学。留学期间，他切身感受到美国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立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1918 至 1919 年，晏阳初在法国战场劳工营为华工服务。在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感受到华工不识字的痛苦，同时也发现劳工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识字班。四个月的教学，居然使工友们能读报，会记账，会写简单的家信，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晏阳初深受启发，他说：“我在法国开办华工识字班，

表面上看是我在教育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他认为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强大的国家。国内文盲众多，这些文盲是潜力巨大的“脑矿”，需要广泛的平民教育来开发这巨大的“脑矿”，唤醒民众，进而拯救国家。他下定决心，回国以后，“一切高官厚禄，视之若屣，惟致予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一息尚存矢志不渝。”

1920 年夏，晏阳初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即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 年 8 月，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简称“平教会”），作为向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总机关，晏阳初出任总干事。起初，平教会的识字扫盲工作重点在城市。到 20 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分会，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都市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 20 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晏阳初又把目光投向农村，他认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而农民又患有“愚、穷、弱、私”四大病害，要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农村。1926 年，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开启了乡村教育实验的先河。在实验过程中，晏阳初逐步认识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使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在乡村办教育如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不进行建设的教育是要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于是，决定把定县乡村教育扩大为乡村建设实验，“希望通过实验找到建设中国农村并使农村现代化（非西方

化——原注)的最好方法和技术”。

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住进泥巴屋”,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1929年,晏阳初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和4个孩子由北平迁居定县。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留学归国博士、硕士、大学校长,他们抛却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妻挈子,扎根于贫穷落后的定县乡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培育国本,振兴民族”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一时间,“博士下乡”成为美谈。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所倡导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内容与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以及科学简单化、农业科学化,乡村教育与农村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措施与方法,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几年的努力,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定县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10月到定县参观访问后撰文称赞定县的工作是“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之外,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过的”。卢作孚也曾派人到定县参观学习。

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没有进过大学而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一人”。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之家。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他自学成才,做过中学教师,当过记者,26岁就担任了《川报》报社社长兼总编。卢作孚少年时期即怀救国之志,年仅17岁就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奔走呼号。以后又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国家的希望。他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要使民众觉悟,必须广开教育。几乎与晏阳初同时,卢作孚开始了教育救国的实践。

1921年,卢作孚在四川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时,即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但因四川军阀混战,川南新教育实验被迫中止。1924年,卢作孚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继续推进民众教育。然而红火了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这些实

验都是依靠军阀势力的支持,很快就因为政局更替而夭折,使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苦苦思索,并到上海等地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本出路在于“促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物质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此在中国应成一种极其鲜明的运动,分析起来,第一是产业运动,第二是交通运动,第三是文化运动,第四是国防运动”,使国家强大起来。怎样才能使国家强大呢?首先要兴办实业。他决定办一两桩事业或经营一两处地方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场所,找出方法为实现国家现代化作参考。

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回到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发展交通作为现代化的前驱。这是卢作孚第一个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场,他确定的公司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成为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

当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华北掀起乡村建设热潮的时候,卢作孚也在自己的家乡积极谋划乡村建设。1927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



1982年晏阳初在纽约寓所留影

(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

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北碚由歹徒横行的偏僻乡场,变成了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镇,成为与定县、邹平齐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这个名字“三年即闻名于全川,四年即闻名于全国,抗战时期它甚至于闻名于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1931年春参观北碚之后称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1936年,黄炎培在游览了北碚所写的游记中说,以前“北碚”二字“在地图上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誉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是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1931年5月24日的北碚《嘉陵江日报》载文称:“国内外人士讲评,全中国有三大干净的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这三大干净地方都是乡村建设实验区,这里所指的“干净”不仅是清洁卫生,更指这些地区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正如一位记者参观北碚所感觉到的“处处透露着新生的光芒”。

晏阳初和卢作孚这两位四川同乡,虽然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但是,他们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理想,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相通的。正如晏阳初参观了北碚建设后所说的那样:“北碚有卢作孚先生所热心经营的乡村建设区,他无论如何要我和梁漱溟先生前去参观一下,我看到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能和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注重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他们所作的种种工作,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他们一北一南,在建设“现代化乡村”的共同目标下,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创造出了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和实业兴乡的“北碚奇迹”,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杰出代表。

正是这个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使晏阳初和卢作孚相知并相识了。晏阳初与卢作孚相知已久,据晏阳初晚年回忆“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哪一年与他始交。我们在定县的时候,他已对乡村改造发生兴趣,曾请一位姓何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作。”他们相识是在1935年。

1935年10月,晏阳初在江苏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会后在南京与从广西考察回来的卢作孚第一次会面。晏阳初见卢短服布衣,一点没有大老板的奢华,第一眼就对卢产生好感,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对于此次会面晏阳初十分高兴,返回定县后他在给平教会同仁作报告时说,“在南京还遇到了卢作孚先生。他是四川的一个实业家。我们彼此相知已久,却从未会过面。这次在南京会面之后,一见如故。大家谈谈奋斗的经过,不禁引为同志。因为他在四川的努力,不仅是为四川而四川,目光也是注于全国,对于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注意的。他最近从广西回来,他认为广西的前途很有希望。他也希望我们派人到四川去帮他们的忙。”此次会面后,卢作孚和晏阳初相互引为知己,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密切交往,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

二

晏阳初和卢作孚初次见面,便开始了他们合作的第一步。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着手推进四川建设,以为抗日战争中的最后重要根据地。1935年秋,曾电促晏阳初将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工作在四川推行。四川省主席刘湘也电函交加,恳请晏阳初回川协助建设工作。晏阳初虽然认为建设四川意义重大,也愿意为家乡建设出力,但由于对四川军阀以往的作为甚为不满,对入川之事颇为犹豫。他反复与刘湘函电往来和与有关人士接触,了解四川的情况。正在此时,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专注于实业无心仕途,再三推辞,而刘湘一再挽留,卢作孚只好从命。这件事使晏阳初受到鼓舞,他认为刘湘能启用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做建设厅长,证明确有建设四川的诚意。晏、卢10月南京会面即探讨了有关四川建设问题,卢作孚热切地希望晏回四川,推动四川建设,晏阳

初遂下定了回川襄助的决心。

1936年2月,晏阳初与卢作孚在南京“数度接洽”,讨论平教会入川协助四川建设问题。晏阳初认为,四川建设千头万绪,所要的建设计划纷繁复杂,非有一个协调的机关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协调整理作通盘打算不可。他提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名称叫做“设计委员会”,其主要活动为襄助建设厅,主持对全省建设的设计。希望平教会与建设厅“协联共济”,开创四川建设新局面,卢作孚对此“甚为首肯”。晏阳初感到与卢作孚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愉快:“京中畅叙,快慰无任。”

3月,晏阳初前往成都,受到卢作孚及各界的热烈欢迎。在蓉期间,晏阳初与卢作孚等详细会谈,取得圆满结果。省政府主席刘湘抱病与晏阳初面谈,完全同意晏阳初、卢作孚等拟定的各项计划,并企盼省设计委员会不仅应担负起全省建设全权设计的设计,更要监督各项计划推行的全过程。刘湘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并劝服晏出任副委员长,实际主持设计委员会的一切工作。

1936年10月,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除省政府各委员为当然委员外,又采纳晏阳初的建议,聘四川、华西、重庆三所大学的校长及平教总会同仁陈筑山、霍六丁、傅葆琛、陈志潜、陈行可、常得仁为委员。同时联络省内外各科专家,参与各方面设计工作,延揽了大批人才为四川建设出力。

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省建设厅合作开展社会调查。此外,平教总会从省建设厅主管的农事工作中择取棉作改良及园艺两项,直接管理。将定县培育成的优良品种在四川实验推广,同时,将定县的生计训练及表证推广方法也引入四川。

1937年3月,省设计委员会正式确定以新都县作为社会政治改革的实验县,全方位地推进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此后,平教会又在成都、南充、泸县等地开展平教运动。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从改革建设厅本身着手,打破旧有的衙门作风,树立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通过调查研究,重点兴办了与国计民生最重要的事业如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尽管,卢作孚在建设

厅任上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但四川建设已初见成效,农业增产,资源调查有新的发现,交通运输得到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到四川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和卢作孚主持四川省建设厅,他们相互配合,各展所长,给四川建设带来了新气象,开创了新局面,为四川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为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国民政府的立足地和巩固的大后方创造了条件。

三

由于日本侵华,1936年6月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撤离定县,南迁至湖南长沙,选择衡山县为实验县,推广定县的经验。此外,还创建了“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为宗旨”的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这种培养农村急需的双重能力人才的办学方针,是中国教育史的又一创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的工作重点转向为“农民抗战教育”。他们组织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湖南的爱国青年学生,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宣传动员农民参加抗战。同时,协助湖南省政府组织了有数千名学生和中学教师参加的民众训练团,这些学员受训后分赴各县宣传组织民众,半年内训练民众达百万人,为湖南的抗战动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晏阳初领导平教会在湖南的工作,卢作孚极为关心。1938年8月,卢作孚在晏阳初的陪同下到衡山视察。参观了衡山的各项建设后,卢作孚赞扬衡山实验县在财政整理、教育改造、农业推广、合作社的发展、卫生工作的推行等方面,“都有很重要很有意义很着实的成就”。

武汉失守后,平教总会迁至四川。办一所培养乡建高层次人才的学校是晏阳初多年来的心愿。1936年曾在定县办农村建设育才院,因日本入侵被迫停办。随着乡建工作在湘、川、赣等省的扩展,乡建人才的培养已成当务之急。1939年春,晏阳初开始积极筹办乡村建设学院。在选址问题上,平教会有人主张在江西,有人主张在成都,也有人主张在重庆。最后,晏阳初选定重庆北

碚附近的歇马场。卢作孚热烈欢迎晏阳初和平教会来到北碚。在乡建院的筹建过程中,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由于战时土地居奇,极难获得土地出让,建校征地时卢作孚多方奔走,大力协助晏阳初,用时8个月才购得500亩土地。此外,卢作孚联络合川3位乡绅捐赠100亩土地给平教会,用于建设农场和实习基地。经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1940年10月,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更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晏阳初担任乡建院院长,卢作孚担任会计董事,共同担负起培养乡建人才的重任。

由于晏阳初20多年来推进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巨大影响和贡献,1943年5月,在纽约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上,他与爱因斯坦等10人被美洲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

和晏阳初一样,卢作孚一生不愿做官,当四川建设厅长也是推辞不下,才勉强就任。1937年7月初,卢作孚辞去四川省建设厅长职务,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实业界人士赴欧洲考察团,准备赴欧洲考察,专心发展实业。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卢作孚毅然放弃到欧洲的考察计划,立即投入抗战工作之中。他要求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所有的船只,所有的人员都投入到紧张的战时运输之中。同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卢作孚临危受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为抗战殚精竭虑。

特别是宜昌大撤退,更显示出卢作孚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智大勇。武汉陷落后,“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此时,抢运形势尤为紧急,一是船只奇缺,按当时所有能参加运输的船只的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物资要全部运到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二是日军节节逼近,人们恐惧不安,争先恐后要求撤出宜昌,十分混乱;三是川江枯水季节临近,必须在枯水季节到来前完成抢运任务,否则水位降低装载大型机器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在这关键时刻,卢作

孚处乱不惊,力挽狂澜,决定抢在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在40天内把滞留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完毕。在卢作孚精心指挥和组织下,抢运工作迅速有条不紊的展开。40天以后,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两岸的器材全部运输完毕。在这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是主力军,参与抢运的24只轮船有22只是民生公司的。卢作孚由于昼夜奔波,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

对于卢作孚指挥和组织的这场成功的大撤退,晏阳初是亲身感受的。1938年10月下旬,晏阳初自长沙经湘西入鄂西到达宜昌,此时卢作孚从武汉到达宜昌组织撤退。两位好友同聚在宜昌,不同的是一个是亲自指挥大撤退,一个是亲身感受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后来,晏阳初对宜昌大撤退予以高度赞扬,把它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确,1940年5月,发生在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使逃亡的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退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宜昌大撤退的意义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其英勇悲壮的程度更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把大批人员(其中大多为各界精英)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大多是军工企业)安全转运到大后方,为后方建设提供了人才和物资条件,使后方迅速建起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军事工业基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

晏阳初与卢作孚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而且私交甚好,情谊笃厚,奉为至友。

晏阳初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家的大门总是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大人小孩都是他最欢迎的客人。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说:“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卢作孚先生从不肯麻烦别人,但可以让他的孩子在假期里住在晏阳初先生家里,晏先生也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而严格地教育他们。”平教会南迁后,晏阳初一家先

暂居成都,乡村建设学院建成后,又举家移居北碚,晏卢两家便多了往来。

1939年初寒假和1941年暑假期间,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次子卢国纪到成都旅行,两个孩子住在晏阳初家里。卢国纪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到:“晏伯母是一个美国人,性格很开朗。知道我们要到成都去,他们全家人早已在盼望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住在他们家,受到了异常亲切的款待,使我们觉得犹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般。”“父亲的许多亲密朋友中,惟有晏阳初家的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相互之间最为亲切。他们家的男孩子成了我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的女孩子成了我姐姐和妹妹最好的朋友。”

1944年3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为准备参加大学考试,卢作孚特地将他送到晏阳初家,与晏的两个儿子一起跟晏夫人学习英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晏夫人严格要求,规定在家只准讲英语,不准讲汉语,使其英语提高很快。

不仅如此,晏夫人还当过卢作孚的英语老师。抗战期间,卢作孚即开始思考战后建设和航运业发展问题,深感对外交流之必要,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和工作之余学习英语。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向乡村建设学院教授孙恩三和晏阳初夫人许雅丽请教。晏阳初晚年还能回忆起当年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后,就能看懂英文报。那时他大概50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简单的可以应付。”两年之后,卢作孚英语水平大有提高,“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能熟练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

1944年10月,卢作孚到美国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时考察美国造船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正好晏阳初为了给乡村建设学院筹募捐款还在美国未归。两人在美国的相聚,又留下了一段见证他们交情的佳话。卢作孚一向生活简朴,布衣粗食,即使在担任政府要职以后也仍然穿着民生公司的麻布制服。晏阳初在纽约迎接卢作孚时,见他仍然穿着朴素的民生服,剃着光头,就笑着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便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还手把手地教他打领带。看着卢作孚的光



卢作孚(1893—1952)

头,晏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个和尚呢。”卢作孚听从晏的劝告,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可见晏阳初对卢作孚细心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

在美期间,卢作孚看到晏阳初为了募捐日夜奔波,辛苦操劳,生活十分节俭,深受感动。回国后在给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讲演时,动情地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晏院长在美国募捐,住在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晏阳初回国后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最后相聚是在1949年11月。19日晏阳初和卢作孚同机从重庆飞往香港。晏阳初是去台湾参加农复会工作会议,卢作孚是为了保护滞留在香港等地的民生公司20余艘主力船返回祖国大陆。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国民党多次派要员劝说卢作孚去台湾,都被卢婉言谢绝。因此,卢作孚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为卢作孚安危担心的晏阳初劝说卢作孚到美国暂避一时,再做打算。卢作孚非常感谢晏的好意,但是他说:“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

我什么也不怕。”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香港一别,竟成永别。

晏阳初没有留在台湾而去了美国,1950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把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经验推向了世界,为平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1990年以百岁高龄谢世。

1950年6月,卢作孚在香港党组织的协助下带着滞留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然而,壮志未酬,于1952年2月不幸逝世。

30年后,晏阳初得到卢作孚的死讯,他不禁悲从中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择要录下:“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

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没有忘记卢作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卢作孚,享受着卢作孚创造的美丽与宁静的北碚人民更没有忘记卢作孚。在卢作孚当年亲手修建的平民公园(现北碚公园),北碚人民为纪念这位北碚的开拓者竖起了卢作孚汉白玉雕像,在雕像后面的石壁上镌刻着晏阳初所写的这篇文章。如果卢作孚泉下有知,他大概也会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阳初!”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家庭保健报
FAMILY HEALTH MAGAZINE

欢迎订阅

2010 年家庭保健报



一报在手 健康无忧

邮发代号: 13-3

订阅方式: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局订阅咨询电话: 11185

报社订阅咨询电话: 0451-84652433 87652269

报社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

全年定价: 111 元

书屋 2009 年第 11 期目录		
书屋讲坛	喜忧参半的网络民意风暴	蔡永胜
	争鸣·宽容·民主	蔡家园
书屋品茗	畅销书闲话两则	雷池月
	咏史诗里的中国风景	刘 逸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道德变动	
	——读《破与立的双重变奏》	陈金龙
	穿越历史的沉重	
	——《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札记	吴增辉
	热爱老大哥与奥威尔	杨光祖
	红楼漫论(五题)	徐振辉
	诗钟杂话	蒋谱成
灯下随笔	传统文化是玩的还是用的	许博渊
	“儒、释、道”及其他	柳士同
	一个“猴群模型”引发的道德话题	宣 杰
	“有馥”的哲学	韩立平
思史佚篇	“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贺越明
	亡命走长白	
	——我在“文革”中的三年逃亡	鲁 钝
人物春秋	张岱与陈继儒	张则桐
	寂寞文章几人识? ——毕倚虹的悲欢人生	张永久
	《芜野尘梦》中的爱情绝唱	于继增
	胡适梦想进牢狱	房向东
	徐志摩惹祸的三篇序跋	彭林祥
	文怀沙生于1910年无疑	陈福季
说长论短	对刘备、曹操道德评价的古今之变	刘晓洲
	战国时期的“国”是“主权”国家吗?	蔡放波
	让胡适蒙冤受屈的一句话	方 宁
域外传真	一艘潜艇引发的风波	
	——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秘闻	彭 华 编译
<p>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6.00 元</p> <p>地址: 长沙市韶山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p> <p>电话: 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 0731-85790197</p> <p>邮箱: nlh5314@263.net</p>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 顾英奇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祿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一)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祿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

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〇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

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建议: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

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两码事了。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



刘少奇逝世后的照片

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

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

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

（顾英奇，1930年生，辽宁新民人。主任军医。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谋部警卫局保健处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军医、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副部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

• 燕 凌

六十年了,不禁回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是在哪一天举行的?在什么地方?

这还用问吗?现在,一般都说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国庆节不是10月1日吗?那幅有名的、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几次修改最后又还原了的油画《开国大典》,画的不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仪式的情景吗?

是的,这已经习以为常被认为当然了。可是,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国庆”和“开国大典”并不是一回事。把天安门城楼上那个场景叫做“开国大典”其实是个误解。

有《人民日报》当年发表的全部有关报道为证。

请看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协开幕

【新华社北平二十一日电】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别邀请代表张治中、特别邀请代表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十二人在今天的会上相继发表讲演。

在会议开幕前,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了会议各类代表的名额和已经到达北平的代表人数。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提出了关于大会主席团八十九人的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提议,

得到全场一致的通过。主席团八十九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各七人;民主建国会代表三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四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中国致公党代表、九三学社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一人;各地区代表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十一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三人;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二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二人;其他全国性人民团体代表八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二人;产业界民主人士代表三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二人;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二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一人;特别邀请民主人士十一人。会议的秘书长是林伯渠。

当被通过的主席团登上主席台后,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会场外鸣礼炮五十四响,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至五分钟之久。

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生动地扼要地叙述了会议召集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主席的充满说服力量和乐观情绪的演说,几乎每一句都引起了会场雷鸣似的鼓掌。

在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在长时间掌声中结束以后,全场起立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静默三分钟志哀。

十二位讲演者的讲演都受到会场的热烈鼓掌

欢迎。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各方面力量,说明了关于新中国光明前途的共同信念。……

这里面列举的许多人名、单位名称和代表人数看起来似乎很枯燥,不厌其烦照抄在这里,是希望过去看过的读者从中重新温习一下当年人民大团结的风貌,而希望没有看过的比较年轻的读者也能够细细品味其中包含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名词和数字是枯燥的,而其中代表的那些人和事,放在当时的环境中看,却是活跃生动、丰富多彩的。

不能忘记,毛泽东主席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就是这一天在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的。也就是在这篇开幕词中,他宣告:“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同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社论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揭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这个会议,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与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社论中回溯:“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一日,正当(蒋介石集团召开的)伪‘国大’完结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出了对时局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胜利地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地召开了人民自己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社论最后殷切地期望:“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政协会议决定新中国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并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

即本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政协会议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的图案,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北平为首都改名北京,以公元纪年。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

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人民日报》的头条大标题把《共同纲领》称为“人民大宪章”,10月1日的社论中称之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政协会议于9月30日闭幕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三十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它的最后一天选出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的选举结果如下: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今天的会议的其他结果是:选举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见另电),通过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见另电),通过了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见另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见另电)。在今天的会议议程完毕以后,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闭幕式。……

这个名单初看也未免有些枯燥,但从其包含的时代风云来看,就并不乏味。

同时报上发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也值得再次精读。宣言宣告:“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当时,是把中国共产党包括在“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之内的,不像后来,只把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称为“民主党派”,似乎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非民主党派。



1949年10月2日的人民日报

宣言中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宣言告诉全国同胞:人民政协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副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典礼上的闭幕词。闭幕词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欢呼:“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成功!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这一天《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万岁》,开宗明义:“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开国盛典已经举行过了,那么,10月1日天安门的盛大集会,又是什么性质?

也请看看当时《人民日报》上是怎么说的。

10月2日的头条大标题是:

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很清楚,这是宣布和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

那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那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显然是把他在政协开幕词中的话搬到这里来了,而且字句也不完全准确。

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10月1日庆典消息是这样开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

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正式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然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在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宣告成立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确信,我们已是一个不可被战胜的国家了,我们要

迅速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有步骤地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现中国人民革命的大宪章。”

放宽尺度,也不妨说:从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人民政协开幕,到10月1日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可以统称为“开国盛典”,但是决不能只把10月1日的集会称为“开国大典”,而把真正的开国盛典(9月21日的政协会议开幕)抹杀了。

也许由于当时人民政协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而中央人民政府庆典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引起众人瞩目;也许由于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分不大清楚,或者由于后来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而人们容易把开国盛典与国庆日混为一谈;也许由于人民政协和《共同纲领》后来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种种因由,使得当年本来讲得很清楚的“开国盛典”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后来渐渐被混淆了,以至于把本原的真正的开国盛典遗忘了。

然而,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还需要大力推进和深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从作为开国盛典的人民政协会议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成分。因为,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共同纲领的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共同纲领所体现的那个社会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血管里,流动着的相当大的成分还是共同纲领所体现的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

当年那些日子里,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编发这些稿件、组织版面的时候,我每一天心情都是兴奋激动的,兴高采烈的,几乎天天彻夜工作不知疲倦。10月1日那天清晨更是刚把报纸大样付印就同报社参加庆典的同志们一起到天安门去,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在游行的灯笼火把丛中回到报社,立即又投入庆典版面编辑工作。内心涌动着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美好前景、人民民主力量大团结的和谐气氛。只想“前途是光明的”,而不想“道路是曲折的”。曲曲折折到了80年代,进入老年,才又感觉到渐渐恢复了一些当年的青春气息。也就越来越想念,当年本原的开国大典是不能忘怀的。(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李晨)

我斗胡耀邦

• 老 鬼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20年了。

我还记得大约是1964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的自我革命。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美。所以狠挖自己总跟人搞不好关系的根源,向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猛烈开火。不断地、相互比赛地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揭发,自我批判。

我是学生,学习却不好。怎样证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别渴望参军打仗。当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觉得考验和表现自己革命的机会到了。在运动中紧跟“伟大领袖”,紧跟中央文革,紧跟《人民日报》,为当个红色打手、红色暴徒、红色造反者而积极努力。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首都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后脖领,攥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



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的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20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可想而知。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20年之后,1987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些了解,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1979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这两位青年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

干部就更躲得远远的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 61 个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 61 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 40 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 年 70 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 189 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暄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1987 年 1 月某天晚上，我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 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来自广西的信，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我岳父孙洪泉（广西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 1989 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搦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还认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但唯他这个总书记却干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这个当众痛哭，“不深沉”的总书记最受广大民众爱戴！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作者原名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 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 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 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 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任编辑，1989 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

· 朱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我们经历了一场没有预料到的世界金融风暴的巨大挑战。二十年前建国 40 周年时,我们也曾遭遇到两场没有联系的国际风暴的严重冲击。一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我摧毁,苏联迅速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等 15 个独立的国家。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遏制的主要对象。另一场风暴是 1989 年 6 月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了连续多年的制裁,施加了极大压力,企图对华“以压促变”。

社会主义各国从一开始就面临改革问题

1945 年,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推动下,按照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 年后加上中国、越南、老挝共 13 个(后来又有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占世界总人口 1/3、陆地面积 1/4、工业产值超过 1/3 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 年全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这个估计是过头了,但 20 世纪 50 年代是国际共运最兴盛的年代。

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阵营 14 个国家和共产党的内部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问题或“倾向”。(一)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想按照本国实际情况建设国家,试图改变苏联的模式,用现在的话就是“调整”或改革。不能否认,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于苏联迅速发展工业、战胜德国法西斯和二战后的恢复重建,曾经起到过正面的作用。苏联模式的主要毛病有:政治上缺乏民主,制造了许多冤案,经济上单一的公有制,僵化的计划经济,片面的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特权和腐败严重,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社会动荡不安。(二)另一个倾向是: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这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领导)”是有矛盾的。

最早出现要按照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要独立自主苗头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结果在 1948 年被苏联开除出“九国情报局”。中共当时对开除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文。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到 1955 年才同南斯拉夫建交。

1956 年 10 月波兰、匈牙利事件时,我们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帮助苏共稳住了同波兰、匈牙利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波兰、匈牙利改革的急迫性,甚至支持苏联出兵推翻了匈牙利才担任了几天总理的纳吉政府。波兰、匈牙利事件后,我们认为主要危险已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左”的思想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动了 25 万华沙条约组织部队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尝试,我们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时又批判“布拉格之春”是搞“修正主

义”。

在上述有些事件中,有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同程度的插手,这并不奇怪,因为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就开始鼓吹“冷战”,并首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和政策。《炎黄春秋》发表过一些文章,试图对上述事件予以重新评论。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错误地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复辟资本主义,它们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罪状有: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利润原则、引进外资、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和私人企业在发展等等。

在那场国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后,我们同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首先恢复了党的关系。1983年7月起,我们按照实事求是原则逐步承认东欧的波、匈、捷、保、东德5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有利于做这些国家人民的工作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和借鉴这些国家经济建设的工作经验教训也有好处”。1989年4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同他会谈,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国际共运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东欧各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人们都很高兴。经过了二十年的分裂、敌对,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开始恢复了友好关系(虽然友好的基础已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们又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阳光。但是没有人预料到,在1989年短短的一年中,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后,开始推进加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87年11月,苏联和美国出版商,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了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这本书轰动了全世界,中国也内部发行了中文版。苏联的改革重点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把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到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正式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在“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的方针指导下,苏联几乎全部主要媒体,都不受限制地重新评价苏联与苏共的历史与现实。苏联的改革从“完善社会主义”迅速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全盘否定与摧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削弱、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再加上长期以来党内的腐败和特权,脱离群众,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社会、经济及民族间矛盾爆发,社会动荡,黑社会势力发展。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多元化”、“民主化”的引导、推动,促使一些东欧国家首先是波兰、匈牙利共产党自动放弃了党的执政地位,或者把一些不接受苏共“改革”模式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搞下了台。

波兰早在1980年,因政府大幅度提高副食品价格为导火索引爆了全国性大罢工,波兰反共的“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受到西方政治势力包括天主教梵蒂冈的公开支持。1982年“团结工会”被禁止,1983年西方授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诺贝尔和平奖”,被波兰政府军事管制了19个月的团结工会重新活跃起来,1988年发动了两次大罢工。处于困境的波兰当局步步退让,1989年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注:即共产党)的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工会多元化的决定,随即提前大选,统一工人党惨败。反对派大获全胜,开创了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向反对派让权的先例。1990年1月,统一工人党十一大通过了党停止活动的决议。

匈牙利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注:即共产党)同波兰一样,1988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出任了30多年总书记的卡达尔等主要领导人下台,一批“激进改革派”掌握了最高领导权。1989年2月,党中央全会又做出实行多党制的决定,提出要创造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结果党自身四分五裂,社会上各种反对党、反对派组织不断出现。1989年10月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改建为社会党。10月18日,匈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改变国名,取消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1989年12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岛举行了重要的会晤,苏美对抗的因素在弱化,合作的因素在增长。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匈牙利族新教神父(持不同政见者)所在教堂,反对地方当局强行迁居的群众示威,矛头很快指向反对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兼国家总统,并采取暴力行动。示威迅速蔓延到首都和其他城市。12月20日,齐奥塞斯库中止对伊朗的访问回国,下令出动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对峙冲突中造成人员伤亡。关键时刻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和军队倒戈。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12月25日,特别军事法庭以屠杀人民、危害国家、破坏国民经济等五大罪状判处齐夫妇死刑并立即执行。“一夜”之间,齐奥塞斯库惊心动魄地被捕并被处死,对中国有很大震撼,因为齐一直对苏联持独立性,在中苏对立的年代一直同中国友好。

苏联的剧变与解体

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加快了苏联的剧变。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而独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立陶宛时首次公开表示“实行多党制也不一定是灾难”。1990年2月5日至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将提交苏共28大讨论的纲领草案,删去了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实行多党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今后的行动目标,来代替27大党纲的“共产主义”目标,重新考虑民主集中制问题,实行总统制等等。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联总统,国家的权力向总统转移。同年7月,苏共28大正式决定改造党,使党向议会党发展。1990年2月起,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在1990年5月担任了苏联的主心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独立日。1991年7月10日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地位名存实亡。

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主张防止苏联解体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成立了“国家紧急委员会”,宣称要使国家走出戈尔巴乔夫发动和开始的“改革”政策的“死胡同”。美国驻苏大使事先将有关的情报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国家紧急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下,叶利钦、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等组织了反击。不到三天,“八·一九”事件就失败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联手把这次事件称为“政变”,一些“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有关人员,有的被杀、大部分被捕。8月23日叶利钦首先宣布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被彻底摧毁。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东欧的剧变,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极大的冲击。当时我们还面临西方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制裁的严峻形势。很多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同志非常悲痛、义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十分担忧。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党不能沉默了。理论界、学术界有的人认为:是“修正主义”导致苏联的剧变,提出要肯定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时发表的《九评》。还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剧变要从“社会主义”思潮中找根源,因此要组织人写出类似《九评》这样的大批判文章,公开批判《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指责我们党同外国社会民主党开展党的来往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肯定《九评》,因为这将导致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否定,会造成不安定。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公开批判外国和外国党,公开批判还必然会涉及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从而影响到共同世界上一百多个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国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关系。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

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1989年起美国带头对华制裁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同西欧和日本关系最好的时期。美、中在1979年1月1日建交后,美国国会于3月26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中、美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斗争后,于1982年8月,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也逐步发展。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中国关系有较快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互有需要,外交上有类似的战略目标;此外,西方有的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种幻想,认为它必将导致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1987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权”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1987年9月,达赖应邀访美,在美国发表演讲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87年至1989年在拉萨制造了多起骚乱事件。

1989年6月4日起,CNN、“美国之音”、BBC等西方媒体连续很多天每隔几分钟滚动播出谴责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新闻和画面,掀起一股反共浪潮。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对中国实施制裁的5项措施,主要是:(一)暂停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二)暂停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三)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要延长逗留美国时间的请求。6月20日,布什又下令:(一)美国将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贷款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考虑中的新贷款。(二)美国政府官员中断与中国政府官员所进行的助理部长级以上人员接触。美国国会还先后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严重地损害了中美关系。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纷纷谴责中国、对中国实行类似的制裁。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和世界银行,也宣布对华制裁措施。7月16日,有日本参加的七国首脑会议(后来加上俄罗斯,称八国集团),发

表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的声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了高潮。

在谴责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议会比政府更激烈。政府从现实利益出发,还要考虑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议会又同政党分不开。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对中国态度很激烈,它们或组织群众游行,或发表声明支持对中国制裁,或宣布同中共暂停来往。

1989年6月12日,美国政府决定,除中止一切对华军售外,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欧共体(欧盟)国家也宣布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仍阻止欧盟对华军售。

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副部长以上人员的政治来往基本上停止了。中国不少驻西方国家大使馆原来“门庭若市”,突然变成“坐冷板凳”。中国代表团路过法国,法国不颁发过境签证。很多国家撤走了在华专家。世界银行的20亿美元贷款、亚洲开发银行的5亿多美元贷款以及日本第三批折合58亿美元的政府贷款都停了下来。美国还提出,要取消同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只是正常贸易或非歧视性贸易,如没有这个待遇,税就高到很难进行贸易了)。美国取消了出售15架波音飞机的合同。当时中美间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是美国帮助改造歼八飞机,价格达到8亿美元,由于美国毁约,白白损失了已经投入的资金,迟迟才被同意把送去改造的飞机拿回来。

1992年9月,布什政府决定卖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总金额58亿美元。法国在1991年向台湾出售价值约27亿美元的6艘护卫舰。

1989年6月4日后,到中国来的外国公务、经贸人员和游客骤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五星级饭店一晚上只要10美元还包括早餐,但是很少有人住。

总之,西方的制裁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困难,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坚持原则,多做工作,打破制裁

“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对美国 and 西方的制裁采取

分别对待,多做工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外交部多次声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发表声明,反对对中国施加压力、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中央对外联络部做了工作,使1989年6月20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18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专门反对中国、禁止同中共来往的决议。

1989年7月,针对美国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措施,中国提出了取消1990年根据富尔布莱特计划向美国派留学生的计划,停止接受美国派来“和平队”的计划,拒绝“美国之音”派来替补记者等。

美国带头提出停止同中国的高层接触,但是美国布什总统却一再给邓小平来信,并在1989年7月和12月两次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同邓小平会谈。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摸底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想解决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方励之夫妇1989年6月后一直在美国驻华使馆“避难”问题;巴黎正在举行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没有触犯美国,美国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在斯第二次访华前,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请他回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建议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注:以上谈话见《外交十记》)

七国首脑会议成员中最先放松制裁的是日本,由于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日美矛盾比较突出。1990年1月,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同年4月,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国际局(部)长爱知和男访华,并邀请中联部部长7月1日访日。这次访问建立了两国执政党的友好关系,海部俊树首相在会见中联部部长时说:“在将要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将积极主张不孤立中国的立场。”他随即在7月9日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日本决定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

款。1991年,海部俊树又是西方对华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政府首脑。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班牙及其他西欧国家陆续放松了制裁。

反对制裁的斗争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开展了全方位、积极的外交工作。1990年,我国同中断了二十多年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同新加坡建交。

随着东欧和苏联剧变,有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为中国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着倒下,对华施加了很大压力,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危胁论”。差不多每年我们都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斗争,反对讨论谴责中国的提案。每年都要为争取美国国会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花费很大的力量。1989年12月,西方赐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布什总统开了接见达赖的先例;1993年以后,达赖访问美国的频率加快,最多一年达三次;克林顿总统曾5次接见达赖,小布什总统4次接见。1993年7、8月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货轮“银河号”装载有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它出动了多艘军舰、飞机,迫使“银河号”在海上漂流十多天后停靠达曼港,对船上全部628个集装箱开箱检查,结果根本没有什么化学武器原料。1995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访问,打破了将近17年的不让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限制。

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国事互访。美国对华高层互访的禁令算是划上句号。但是不久又发生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2001年南海上空美侦察机撞落中国飞机事件。

二十年前的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没有把中国党和政府压垮。相反,中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但是中国仍是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

● 陈桂棣 春 桃

严宏昌是安徽小岗村的前村长。当他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他说，那事儿，大了。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的小溪河、石门山、黄泥铺、董铺、燃灯和红心六个乡镇农户的用水。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说，他在当省人大代表时，就曾为此提交过专门的议案，在当县政协委员时，也递交过专门的提案。

“可是，不知写过多少提案和议案了，当时这事看不出进展。谁知，等到我啥也不是了，这事却突然有了眉目。”

他说那是二〇〇二年元旦的前夕，何效平、孔少林两位副县长和县水务局副局长朱士银，三人心急火燎地找到他，说：“快，一道进京！”

开始他不知啥事急成这样子，一了解，没法不让人高兴。原来当初他的那些议案和提案，最后都集中到了省水利厅，省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燃灯寺水库灌区工程确实也已经需要综合治理了，于是决定将这一项目直接报到国家水利部，请求帮助解决。

严宏昌当时觉得挺好笑，如今不当村长了，却办起了比小岗村、比小溪河镇都大的大事来了，他简单地准备了几件衣服，揣上一千块钱，跟着他们就出门了。

严宏昌和三位县局领导赶到北京时，才知道分别赶去的还有省厅的四位领导，滁州市的三位领导，当天他们都下榻在离水利部不远的白云宾馆。

馆。

为了燃灯寺水库灌区的综合治理，省、市、县一下来了这么多领导，足见对这事重视。严宏昌心里想，自己多年的这个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真的替皖东地区十几万农民感到高兴啊！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就一起赶往水利部。也许向部领导反映问题不需要上去这么多人，仅省、市两级水利部门就来了七位领导，凤阳县还来了两位副县长，也许认为严宏昌是农民，而朱士银也只是个副科级干部，两人掺和在一起不适合，总之，领导们要朱士银和严宏昌就在外面等着，没让进去。

严宏昌的自尊心多少有些受伤，他不明白，既然用不着自己直接反映问题，为什么又要把他从大老远的小岗村喊来京城呢？

可是，省、市、县三级领导进去也没反映成问题，刚进去，很快就出来了。说这事部里不接待。因为水利部每年只能解决有限的几个水库灌区的治理问题，头年才帮安徽肥东县解决了一个水库的项目，凤阳燃灯寺水库即便需要治理，至少也要等到四年之后，才有可能轮到这事。

严宏昌听了，更加郁闷。既然几分钟就可以了解到的情况，干嘛不通过电话事先问一问？一下跑来这么多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更浪费了国家的银子。

结果白跑了一趟，领导们便打算上街买点儿东西，就打道回府。何效平和孔少林两位副县长问严宏昌：“你是不是也马上回去？”

严宏昌想，好不容易来趟京城，就说：“我还准备看看朋友，暂不回去。”

朱士银因为女儿在北京上学，也说：“老严不急着想回去，我也不忙，抽空去看看女儿。”

就这样，省、市、县三拨人马，各奔东西，只为严宏昌和朱士银预付了一天的住宿费，别的一切

全由二人自理。朱士银虽说是个水务局副局长的官儿，毕竟只是副科待遇，和严宏昌一样住不起白云宾馆这样的饭店，和严宏昌一商量，第二天，二人一块儿转移到了万寿路附近原国家农委大院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

严宏昌所以建议搬到这个大院来住，是因为《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就住在里面。这些年，张广友常代表万里去看望小岗人，现在自己来京了，是一定要去看张总编的。可是不巧，一连找了两次，张总编都不在家，严宏昌感到非常的遗憾。

朱士银主要分管水库与灌区工程，又是个想干点事的人，跑到北京，虽看了女儿，但水库之事毫无进展，他显然有点不甘心地对严宏昌说：“我们真的就这样白跑一趟？没有一点办法了？这样回去怎么交代？”

严宏昌说：“领导都不当一回事，我们又能怎么办？”

朱士银叹了一口气，说：“咱俩都是燃灯寺水库灌区的人，守着个大水库，年年缺水，年年收瘪稻，咱就不能替父老乡亲做点好事吗？”

严宏昌自从不干村长以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确实很少再去考虑“宏大”的话题。这次跟来，除做个“随从”，他来北京也只是想轻松一下。然而，此刻，他却冷不防被朱士银这句热心热肠子的话，硬硬地撞了一下，不由抬起头，认真地看了一眼朱士银。

“你倒是说话呀”，朱士银见严宏昌躺在床上望着他，不言语。

这时严宏昌翻身坐起来，又认真看了朱士银一眼。虽还是没有说话，却已经变得激动起来。他何尝不想为父老乡亲把这件实事做好呢！否则，每次人大、政协开会，他就不会提那些议案和提案了。他知道，这项治理工程少说也要两三千万，凤阳县、滁州市没这个财力，省厅需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他提了，也是白提，可一想到当了一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应该为父老乡亲“代表”一把，“政协”一回，管用不管用，那不是他考虑的，他就是要说，就是要喊，要叫！

朱士银忍不住失望地说：“那我们上街再逛一天，后天回去吧。”

严宏昌终于说话了。他忽然问朱士银：“你身上还有多少钱？”这时的严宏昌，已经感到有一股

久违了的激情正在猛力地冲撞着自己；当年闹包干时的那种拼命的劲头，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我还有四五百块。”朱士银说。他不知道严宏昌怎么问起钱的事。

“那就试一试！”

“怎么试？”

严宏昌胸有成竹地说：“我身上也还有几百块，现在咱就开始省着用，明天再去水利部。”

朱士银说：“领导不都找过了，进去就被打发出来了，我们还要再去吗？”

严宏昌说：“他们去，是他们去，当时我们不是没进去么？成不成，这事是水利部在管，我们总得问个明白，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程序，闹清楚了，下一步才好进行。”

严宏昌分析得有些道理，朱士银还是有点犹豫。

第二天，一上班，二人就赶到了国家水利部。虽然顺利地进了水利部的大门，却被办公厅的同志拦住，他们有些奇怪：“你们安徽的一些领导昨天都来过了，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事不行。走吧，走吧！”

严宏昌说：“我找部长只说两分钟的话。”

“找部长？你要找部长？谁都可以随随便便找部长，那部长还能干工作吗？”办公厅的同志不耐烦地挥着手。“这不可能，走，走，走！”

严宏昌顺手从办公桌上取过一支笔，又拿起一张纸，很快写了一行字：“我来自安徽省小岗村，我叫严宏昌，请首长能耽误五分钟，给你汇报一点事情。”

他写好，又认真折叠了一下，递给那位同志，恳求道：“麻烦你，请你递给部长。”

对方将字条丢在桌上，看也不看地说：“这是不可以的。”

严宏昌见对方这样讲话，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招呼朱士银也找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态度诚恳地说道：“我只是想请你帮这一个忙，不会为难你的。如果首长愿意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实在不方便或不愿意，我们马上走人。”

对方看了看字条，寻思片刻，说：“我拿去试试。”说罢就从边门走进一个房间。

很快，那个同志就出来了，他的身后跟出了另外一个男人，严宏昌心想，这八成就是部长。

果然是部长！

部长笑容满面地朝严宏昌走过来，热情地问：“你就是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

严宏昌点头称是。

部长招呼严宏昌和朱士银进去坐。在部长办公室，严宏昌开门见山地把有关燃灯寺水库灌区的情况作了简单地汇报。

部长听完后，说：“部里确实年年都有这方面的指标，可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实在没有办法了。”

“明年呢？”严宏昌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问部长，“明年能不能考虑呢？”

部长笑了：“即便是明年安排，也要得到国家项目规划部门的批准呀！”

严宏昌一听，这事还有一线希望，他高兴地告别了部长，走出水利部，然后毫不心疼地拦了一辆出租车，他要立刻去找那个管审批立项的规划部门。正好这位司机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这样，二人接下来就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始，门卫连这座大楼的大门也不准他们进。严宏昌解释了一番，才让登记进去。二人进了大门，正准备上电梯，又被两个战士阻止，不允许他们上楼。

“你们找谁？”战士的态度很和蔼，却明显带有几分质疑。

严宏昌说：“找这里的领导。”

“具体找谁？”战士问，“我可以先帮你们联系。”

严宏昌说不出具体的名字，战士就不让他们上楼。怎么解释，怎么说明，都没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从电梯里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被严宏昌一口安徽凤阳的口音吸引，打量了一眼严宏昌，就走过来，不无意外地问道：“你是小岗村的严宏昌吗？”

“我是。”严宏昌说，他这才注意从电梯里走出来的这个人，有些眼熟。

来人问严宏昌：“你准备找谁？”

战士把话接过去，叫了一声“杜主任”。就在战士说明情况的时候，严宏昌陡然想起来了，这个“杜主任”，他曾经在杜老——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家里见到过，那时，这位“杜主任”还十分认真地向他了解了小岗村的情况。他想不到杜主任的记性这么好，而且，这么巧，他碰到的这个人，就是国

家发改委的杜鹰。

杜鹰把二人领到自己办公室，严宏昌于是把燃灯寺水库的情况作了一番汇报。杜鹰听得很认真，但最后也只能说：“到年底了，不行了。”

“明年呢？”严宏昌又盯住不放。

杜鹰说：“明年也得按程序报上来。主要还是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

严宏昌这下犯了愁：“到财政部要找哪一位领导才行呢？”

杜鹰问严宏昌，财政部认识谁，严宏昌回忆了一下，说：“我只认识一个叫程微的女同志，她去过小岗，我接待过。”

杜鹰一听，高兴地说：“那就行，我认识的人还不如程微当家，你们就找她。”

告别了杜鹰后，已临近中午，二人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点点东西，这时严宏昌把他的“联络图”掏了出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这么多年了，凡是在小岗认识的，或是外出开会办事时结识的，只要是他认为今后会对小岗或自己有好处的官员、专家、学者和记者，他都会把他（她）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抄在这个本子上。他把这些视为自己的财富。

现在，严宏昌很容易就找到了程微的手机号码，并把电话打了过去。

当时程微正在医院吊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候了一番后，严宏昌就把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程微对小岗村，以及对小岗村周围农村的发展，也非常关心，不过她为难地说：“我们财政部的钱确实是多，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往下拨。你们的这个项目，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分管农业的副委员长批示才成。”

严宏昌一听，心中不觉一沉，只差没有喊出声。分明是越找麻烦越大了。不由搔了搔头皮。

朱士银更是暗下叹气。他跟着严宏昌一直没说话，也插不上话，只感到越找，官越大，想不到这事还得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一个小小的副科干部，平日去见县长、副县长还有些难，现在要找这么大个官，他是一点法儿、一点辙儿都没有。

他几乎是绝望地看着严宏昌。

离开医院，来到大街上，严宏昌又掏出了他的小本子，仔细地翻找着。

朱士银惊诧地问：“全国人大你也有认识的人？”

严宏昌没有理他，仔细地来回翻找。

突然，严宏昌惊喜地叫了一声，说：“找到了！柳随年去过小岗，我接待过，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柳随年是谁呀？”朱士银茫然地问。

“原是物资部部长，在人大管过财经，现在估计就是在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严宏昌回忆说。

朱士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他的电话你也有？他会见我们吗？”

严宏昌毫不犹豫地把电话打了过去，自报家门后，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电话的那头马上就传来了柳随年的问话声：“你什么时候来的？”

严宏昌激动地说：“到北京已经几天了。我想直接向您汇报一件事情，不知您是不是有时间？”

“行”，柳随年爽快地答应了。“明天吧，明天上午你来中南海西门，到了以后，叫门卫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给门卫打招呼，你就直接到办公室找我。”

严宏昌把通话的情况告诉了朱士银，朱士银兴奋得跳起来。

第三天，二人来到柳随年说的那个大门口，请门卫把电话打进去通报一下，里面回了话，才知道，情况已有了变化，柳随年临时有事，去了钓鱼台国宾馆。

直等到中午时分，严宏昌才给柳随年的家里去电话，想不到，那边接电话的正是柳随年，原来他已到了家。

“来吧！来我家。”柳随年热情地说，同时详细告诉了住址。二人买了点香蕉和苹果，又抱了一个哈密瓜，赶忙乘车撵过去。

柳随年听了严宏昌的介绍，觉得他反映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想了想，爽快地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说着，便伏案写起来。一会儿，信就写好了，他又看了一遍，放入信封后，交给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信，激动地连声道谢。

两人走出大门时，柳随年关照道：“如果不行，你再来找我。”

严宏昌非常感动，兴奋地说：“柳老，有你这封信肯定行了。你的信不行，那找谁才行呢！”

谁知，柳随年回答得很认真：“如果有问题，我



小岗今昔

还可以找总理。”

严宏昌认为这不过是柳老的一句玩笑话。中国有两三千个县，凤阳县一个水库工程的改造，已经惊动了这么多高层官员，想都不敢想还需要一个大国的总理过问。

短短的两天时间，事情就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手头上并不宽裕，还是决定要庆祝一下子。于是两人跑到附近的一家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席间，朱士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个小小的‘县局’，这次跟着你宏昌算是开了眼界，一家伙见到这么多的京官、高官，不虚此行啊！看来这事真的是有希望了！”

二人回到地下室，发现整个招待所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这才猛然想起，明天便是元旦，所有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统统都要放假！元旦的假期虽只是一天，但常常会把两边的双休日也调过来，放在一块过，这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再摸摸腰包，此刻，二人均已囊中羞涩！

想到要熬过假期才能接着去办事，严宏昌和朱士银打不起一点精神。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将两人的钱凑在一起，除去回程的车票和在京的住宿费，连两天正常的饭钱都不够，还怎么指望呆下来办事？

两人经过认真盘算，作出了一项非常的决定：从元旦起，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一天的伙食费不能突破十元钱；干脆哪儿也不去，这几天就待在地下室熬，也要熬过假日！

呆在这样的地下室,当然啥事干不成,除去睡觉,便只能是没话找话地瞎聊。

这天,严宏昌发愁地对朱士银说:“就是这几天熬过去了,就是有了柳老的这封亲笔信,总还要去找财政部吧,财政部跑下来了,还得去找规划部门吧,规划部门假使也跑下来了,最后还必须去找水利部。这些地方跑下来,不会是三五天、十天、八天能解决问题的!”

朱士银也从最初的兴奋状态中冷静下来了,他也一直在想,这么大的事,两三千万元的一个综合配套工程,总得让人家做点调查研究吧。一个部门呆个十天半个月也不算多。无论怎么说,指望这次跑下来,几乎已不现实。但是,不盯紧,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了呢?

望着光秃秃毫无想象余地的天花板,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严宏昌突然坐起身,又翻出了那个小本子。他找出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自说自话道:“我给朱秘书打个电话试试。”

朱士银心情沉重地问:“哪个朱秘书?”

严宏昌说:“我在想,柳老不是讲他这封信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找总理解决吗?从各方面看,都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在北京就这样待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咱自己直接去找温总理!”

朱士银像被电击了似的,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忙问:“你说见谁?见温家宝?……你有这个办法?”

严宏昌说:“赶到大家上班以后,我试试,同朱秘书联系一下。也只能这样,有当无吧。”

朱士银兴奋得声音都变了,说:“如果能见到温家宝总理,我这辈子就太值了!”

终于,漫长的节假日过去了。严宏昌来到地面上的服务台,他用招待所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朱秘书的手机。很快,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朱秘书谦和的声音,问是哪一位?严宏昌连忙自我介绍,说有一件急事,需要面见总理。

朱秘书相当客气,告诉严宏昌,他正在河南有事,温总理在北京,他要严宏昌把电话直接打给在京的田秘书。

田秘书接到严宏昌的电话后,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你不要离开,我很快就给你联系。”

朱士银在一旁直发傻,羡慕地问:“宏昌,你怎么认识这些秘书的?”

严宏昌掏出“哈德门”香烟,点上一支,波澜不惊地说:“他们来小岗做过调研,有的还到过我家。”

严宏昌一支烟还没抽完,田秘书的电话就到了。他告诉严宏昌:“你明天上午八点半到中南海北门,有人接你进来,总理等着你。”

朱士银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手舞足蹈,不知如何是好,一定要严宏昌到时把他也带上。

这天,天还没亮,朱士银就把严宏昌捣醒了。他们乘车赶到北海附近,见时间还早,就在附近溜达了一圈,等到八点半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

走到门前时,武警战士打量了一下二人,庄重地敬了一个礼,说:“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严宏昌说:“我们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武警战士让二人稍候,不一会,就从里面走来一个人。此人中等偏高个子,方头大脸,是个长得很精神的年轻人。严宏昌老远就认出,来人叫黄守宏,也曾去小岗村搞过调研,他们早已经熟识了。

黄守宏说笑着,把他们带到一间接待室,说总理正在开会,很快就过来。

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只见温家宝带着大家在电视中早已熟悉的的笑容,大步走过来。严宏昌和朱士银忙起身迎过去。

温家宝握着严宏昌的手,亲切地问:“你们住下了吗?”

严宏昌说:“住下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温家宝同朱士银也握了握手,回头问严宏昌。

严宏昌想:自己的困难再大,那也是小事,不能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这些事操心。他高兴地回答说:“没有!”

“没有?”温家宝又认真地问了一句。

严宏昌再次郑重地回答:“我个人没有困难!”

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作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为不耽搁总理宝贵的时间,他掏出了一份只有几百字的“报告”。

这还是头天晚上,他从招待所讨来的一张公文纸,在地下室公公正正写出的一份“书面报告”;

为便于联系，他还在上面注上了朱士银的手机号码。

严宏昌说：“总理，您很忙，主要情况我都写在上面了。”说着递了过去。

温家宝接过信，说道：“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明天我再和有关的同志协商一下。”接着，他把信递给黄守宏，交代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严宏昌注意到，总理对自己这份极不正规的“报告”，是那么重视，他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想想总理也见到了，“报告”也直接送到了，就说：“总理，谢谢您！我们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以后再来向您。”

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士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并叫黄守宏把他们送到中南海的大门口。

重新回到招待所，把住宿费结清了之后，又找到一个订票处，买到了当天到蚌埠的硬座客车票，这时，两人就只剩下了几块钱。车是晚上六点多钟才开，完全还有时间在北京再逛上大半天，但他们哪儿也不敢去，因为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乘地铁赶到火车站后，就只好一路上饿回去；至于到了蚌埠后又怎么转车回凤阳，也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两人离开招待所，直奔车站而去。在车站的广场上，蓦然间，朱士银的手机响了起来。朱士银原以为是女儿打来的，一听，是位男士的声音，要找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手机，也感到奇怪，竟是万里的秘书打过来的。但他很快明白过来，想到自己留在温总理“报告”上的联系方式，正是朱士银的手机。

王秘书在电话中说：“老严，你到了中南海都不来看万老吗？万老叫你来一下，还叫你联系一下吴象同志，你们两人都去。”

严宏昌怎么不想去拜望万老呢？他和小岗人可都一直想念万老啊！可是，他和朱士银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再误了晚上的这趟火车，他们就连安徽也回不去。总不能见到万老开口就向他老人家借钱吧，那成了什么样子？

朱士银一听是万里秘书来的电话，要严宏昌到他那儿去，后悔得直跺脚，连说：“亏死了，亏死

了，早知道这趟出来也多带点路费！”

严宏昌只得扯谎。他对王秘书说：“吴老的电话我联系不上，再说，我这趟是因公出差，回程的票已买好，马上就要上车了，急等着回去复命。下次来北京一定一定去看万老！”

就这样，怀揣着巨大的喜悦，也怀揣着巨大的遗憾，饿了一路，也激动了一路。到达蚌埠时，天还没完全亮。二人出了车站，就忙着去找出租车司机，商量把人送到地方再给钱。二人最后说动了一位司机，终于疲惫地回到了凤阳县城。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朱士银从自己局里要了辆“桑塔纳”，叫司机直接把严宏昌送到小岗去。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段永霞就告诉他，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士银的人来电话找他，说有重要事，要告诉他。

严宏昌想不出才离开凤阳，刚刚分手，又会有什么消息这样急着要告诉他呢？他把电话打过去。

朱士银在电话中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会这么快？”严宏昌简直不敢想象，“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士银说：“刚才有人打了我的手机，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敢相信，忙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总理秘书。’”

温家宝的批示在第一时间就被电传到国家水利部，国家水利部马上电传到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水利厅又惊又喜，迅速电传到滁州市水务局。省厅、市局两级领导终于知道是严宏昌在北京为安徽省、为滁州市办成了一桩通天大事。于是，那一天进京的原班人马，再次乘机赶往北京，要去找严宏昌。

到达北京，四下里打听，却不见严宏昌的人影。于是试着往他的家里去电话。电话一打，才知道严宏昌早已回到了小岗村。

于是，他们又飞回安徽，连同凤阳县的两位副县长，一道驱车赶往小岗，去看望严宏昌。临走时，送给了严宏昌两条上好的香烟，以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

（陈桂棣、春桃 作家。著有《中国农民调查》，本文收入《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责任编辑 李 晨）

大跃进中的村办劳动教养

• 肖磊

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声势的推动下,所谓村办劳动教养(亦称村办集训,下同)也应运而生。当时把村办劳动教养称为“消灭犯罪的创举”。这年3月,中央某部在河南召开了部分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部署了村办劳动教养的任务,说这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大跃进”。“村办劳教是对敌斗争经常性手段之一,对消灭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河南会议上介绍了江苏临汝县、山东汶上县、河北孟县等地开展村办劳教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效果。会议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并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

河南会议结束后,山东有关部门根据会议要求,选择了当时聊城地区的平原、夏津两县作为村办劳教的试点单位。规定试点时间一般要搞20天,如不解决问题,可延长劳教时间。在村办劳动教养试点中,聊城地委发现劳教现场发生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并反映到省委政法部(当时县以上党委均设政法部),他们对村办劳教持怀疑态度。

省委政法部对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随即召集省直政法系统十余名工作人员针对村办劳教及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座谈讨论。座谈认为:村办劳动教养是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的。国务院规定没有“村办劳教”这一条。无论从劳教的性质、范围、劳教对象、批准权限等方面,都是与劳教规定不相符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只有省、市、自治区以及交通沿线大中城市才能办劳教,而且由这些城市的劳教委员会决定和执行。劳动教养主要是对那些罪行轻微不够判刑的人,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把村办劳教当成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显然混淆了两类矛盾。

省委政法部考虑到村办劳教试点中出现不正常情况,决定从省直政法部门抽调十余人组成

工作组,指定省司法厅一副厅长任组长,于这年的5月中旬先后到达进行村办劳教试点的平原县和夏津县。工作组在这里先后听取了两县公安局局长关于村办劳教试点的介绍:平原县村办劳教6千人,夏津县村办劳教8千人,劳教时间均按规定执行。两县公安局长都对村办劳教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成功,效果很明显。他们说:凡进行劳教的村庄,地富反坏老实了,各种违法犯罪未再发生,封建迷信不见了。一些四类分子还交出了“变天账”。通过村办劳教,还“缴获”了许多武器。

工作组长先后听了两位局长的介绍,肯定了他们劳教试点的成绩和做法,称赞他们的“大跃进”精神。多数工作组员认为:调查没结束,先肯定正确与否不合适,不符合调查研究的步骤,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大家背后议论组长的做法不符合省委政法部的精神。工作组员按计划要到劳教试点的乡、村进行调查。行前工作组长再三告知工作组员多看成绩,少看缺点,尤其不要多看黑暗面。

工作组员在平原县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的双庙乡三个村,在夏津县郑宝屯乡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四个村。在这里先后访问了被劳教人员和看押、管理他们的民兵、村干,还走访了曾在村办劳教指挥部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村办劳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是:村办劳教成为村干部惩罚群众的手段。对有缺点的群众(如迷信活动等)用劳教的办法解决。对给干部提意见的,也找借口劳教。对四类分子,不论守法和违法,除病老残幼,一律劳教。对懒汉二流子,神汉巫婆,取神水神药的,打架斗殴的,不服从领导的,不加入合作社的,还有当过汉奸兵的,当过国民党兵的,还有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有海外关系的,都列入村办劳教。

在劳教对象的批准权限上,规定由劳教指挥部决定(即如此,也属非法),实为村干部说了算。村干部指名谁被劳教,就算批准了。

劳教的手段甚为残酷。凡被定为须劳教的人,即通知其携带劳动工具食物到治河工地集合。他们在民兵、干部看押、管理下,挖土、挖泥、加深河道。为了免得民兵、村干看押、管理本村的人破不开情面,他们采取甲村看押管理乙村,乙村看管甲村的交押办法。被劳教人员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大会、小会坦白检举。劳教指挥部把多年未破的积案公布劳教工地,让每个被劳教人员对号挂钩、坦白检举。对一些没有坦白、没有检举的人,抓几个典型,大小会批斗,反复追逼。有的乱编乱造,屈打成招。有的申辩冤枉,被扣上个“顽固不化”对抗劳教的帽子,五花大绑游劳教工地,然后送劳教指挥部反复审讯,迫使交待解放以后作了多少案。1950年夏津县郑宝屯乡一农民被盗耕牛一头,8年未破案。此次村办劳教中,被列为应破的积案,在8千人的劳教工地上全面追查。在打骂、追逼之下,竟有80多人招认偷牛。等劳教试点结束,招认偷牛者全部翻案。因无可靠证据,只好再挂起来。

村办劳动教养被当作破案手段。在20多天的村办劳教中,用发动坦白检举的方法,共获得各种违法犯罪材料4万余条,多是互相揭发互相编造出来的。大量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治安案件也不够。劳教试点结束后,这些材料扔在劳教指挥部办公室堆了一桌子,无人过问。后来听说这些材料无法插手调查,不了了之。

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中,都追缴四类分子的“变天账”。最初,他们再三申辩“没有变天账”,看管的民兵、村干说:“不交变天账批斗没有完,别想回家。”四类分子在如此逼迫之下,回到家中拿出“变天账”。工作组在指挥部办公室看到几份所谓“变天账”,有的写:“从前想变天,现在政府教育好了,没有变天思想。”也有写:“变天没有好下场。”这些所谓的“变天账”都是劳教时的口气,且纸墨笔迹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现写的。工作组访问他们时,回答:“不交上不让走,还要挨批斗,才回家现写的。不识字的找人代写,不交上天天逼。”

劳教工地上,许多被劳教人员难忍干部、民

兵的折腾,不断发生逃跑现象。民兵在追赶逃跑者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不少人因劳累过度、饥饿、疾病等原因,已奄奄一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在被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跑了,跑了,不跑没了”的顺口溜。结束劳教试点时,两个县的劳教工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剩下的人员不足一半,能干活的更少。

让两个县的劳教试点主持人最满意的是“缴获”了一些武器。工作组曾检验过这些武器,都是掉了零件的破旧步枪,是一些乡武装部集中起来准备统一修理的。此前地委工作组也检查过这些破旧步枪,没听说被劳教人员交出过武器。

工作组员本着“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谈多少问题”的要求,向组长作了汇报。组长认为不符合他“多谈成绩,少谈问题”的想法。尽管政法部要求“实事求是”,但他认为“多说成绩保险,多谈问题危险。”他认为村办劳教是上面布置的,又是“大跃进”时期,因此要“多肯定成绩,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组长与多数组员认识不一致。组长背着历史问题压力,怕抓辫子。因此紧紧把握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说话、办事的套路,曾对人说:“只要牢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不会犯错误。”

工作组按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准备了向聊城地委的汇报提纲。地委安排第二书记兼专员赵新亭同志听汇报。了解赵新亭的人都知道他是按政策、法律办事的人。在省委工作组汇报前,他对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情况了如指掌,并与省委政法部领导谈了看法。工作组根据“村办劳动教养是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的指导思想,先充分肯定村办劳教取得的巨大成绩,存在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村办劳教“缴获”了大批武器。赵专员听到所谓“缴获”大批武器时,立即打断汇报说:“什么缴获大批武器,地委已做了调查,都是民兵用坏了的破烂枪支,收起来准备修理的,成了‘缴获’了。地委早就知道没这回事,骗骗地委罢了。”

汇报未再向下进行。赵新亭专员继续说:他们搞村办劳教没有向地委报告。听说打死人了,地委派人做了调查,才知道那里违法乱纪那么严重。不客气地说,村办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我亲自

去劳教现场看了看,见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村办劳教的。我又问,搞村办劳教怎么还打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个县集中一两万人,活逼着他们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还要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不够“标准”的,大会批,小会斗,又打又骂。有的人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自杀。最可恨的是民兵在追赶逃跑的被劳教人员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人命关天,把这样的严重事件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据地委调查组不完全统计,两个县在村办劳教中,被打的3千多人,其中被打伤1千多人。被开枪打死5人,打伤7人,因殴打致死13人,打后致死亡5人。现在一说“大跃进”,就不要政策法律了。劳动教养,本来是对那些失足者以挽救教育为目的,而他们搞的村办劳教成了惩罚群众的手段。不分青红皂白,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劳教”成了吓唬群众的大棒。有的群众说,“听见劳教打哆嗦”。管劳教的干部说:“被劳教的没好人。”这话很荒谬。有的群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可对他们劳教。干部也有不同的缺点,是不是也劳教呢?对四类分子,只要他们不违法犯罪,也不能随意劳教。说“村办劳教是对违法犯罪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此话我不敢相信。消灭犯罪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搞一阵子村办劳教是消灭不了犯罪的。把我的看法和省委王部长通了电话,他支持我的观点。地委几个书记都认为搞村办劳动教养是与政策法律不符的。这种劳教是哪里发明的?有的人脑子发热,乱来,甚至是非颠倒。高唐县一民兵开枪打死偷吃苜蓿草的群众。饥饿争食,何况争的是喂牲畜的草。要处理这个民兵时,县公安局长说:“要保护民兵的积极性。”开枪打死无辜百姓的人,还要受保护,这是哪家的法律?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坚决依法处理。劳教工地上打伤人、打死人的,要坚决依法惩办。政法队伍要整顿纪律,严格执行法律,否则会无法无天。我

说的这些话可能于“风向”不对头,但我认为于事实法律政策对头。

工作组结束了调查,向省委政法部汇报了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的情况及赵新亭专员的谈话。抛开“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话套路,工作组成员们畅所欲言,体现了“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的要求。政法部领导同志听了汇报表示,村办劳教试点先停下来,也不要推广。两个县村办劳教试点遗留的问题,如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要妥善处理。随后工作组向赵新亭专员转告了政法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笔者记录了赵新亭专员听汇报时的谈话。打开半个世纪前的记录,还犹如忠言在耳。这是赵新亭专员对错误的村办劳教的抵制,又一次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精神,令人敬佩。然而在十年浩劫中,这位人民的好专员受尽迫害致死,使人痛心。笔者表示对他的怀念。

(作者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文革前和检察机关重建后,任检察员38年。“文革”中停止检察业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征 订

2010年度新文学史料[季刊]

《新文学史料》创刊于1978年,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同时刊登这个时期的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文学流派、文学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文章及不易见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等。

《新文学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是一部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集学术性、资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史料性刊物,是海内外文学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文学季刊。

* 本刊自办发行。

* 每期定价18.00元,免收邮寄费,全年合计72.00元。

* 全年均可增订、补订。

* 多份订购,折扣另议。

* 来款请寄: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联系电话:(010) 65252161 邮编:100705

种一个“毛主席万岁”

● 毕星星

多年了,这一直就是一个传说。

六十年代文革中间,我们高中同学就传说过,说我们的某某老师,或者校工的一件趣事。正是全国上下表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信仰的热潮中,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画忠字图,不一而足。他当然不甘落后,怎样表现自己的“无限忠心”呢?七亿人开动脑筋,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好像一切招数都用尽了。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自家宿舍门前有一小块地,历来种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入秋这一天,他突发奇想,种小麦,撒种时按照横竖撇捺勾下种,种成“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以他的想像,门前有一个毛主席万岁的美丽图案,整天上班下班看着毛主席万岁,祝告毛主席万岁,也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种地能种出个毛主席万岁,谁对毛主席还能忠心到这个程度?肯定是全国独一份。种出毛主席万岁的图案,看我的新创造!保证轰动四方。

他按照自家的想法下种,不久麦苗出土,黄土地,嫩绿的青苗,油汪汪的一行一行,正行斜行交叉,组成五个大字。同事们都来参观这一处别出心裁的创意。这一块园地,给单位露足了脸,远近都知道这里有一家出奇制胜的妙招,对毛主席,那叫一个忠。

他很得意。不过这得意没有持续多久。当麦苗长到一拃高,要锄地,本来也没有什么,中耕除草,一年要好几遍。可是这会儿抡起明晃晃的锄头在毛主席头上划来划去,他感到了大不敬。要除虫了,喷雾器杀虫剂在毛主席脸上喷射,毛主席身上还能长害虫吗?浇水倒还无妨,可是这一带浇水有个习惯,一般都会随水灌茅粪。屎呀尿呀撒得毛主席一头一脸。一想起这些,得意就变成了心惊胆战。这个时候,单位已经有人开始注

意这个问题,他在这块田地的一举一动已经遭到敏感的关注。他暗暗叫苦,知道这五个字的庄稼没法做务了。当然,最后迫使他停工的是第二年麦子秀了穗。一想到收割时要挥动镰刀,斩断身子,要收要碾,打碎头脑,吃了种子,他就害怕得手脚颤抖。这一块地把他逼得就要发了疯。他不敢管,谁也不敢管。最后只能是麦子自己熟透,种子自己落了地,麦秸黄了干了,烂在地里。

没有人再敢过问,这一块地,结果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大约是我们学校文革中传得最广的笑话。口口相传,说得多了,谁也没有在意,这是哪个老师?抑或哪个职工?哪个同学?在哪个地段种的麦子?大家只顾听得高兴,也不详细追根究底。因此,多年来一直无头无主的。它也就是一个传说。

今年春天吧,有一次和山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晓国攀谈,聊起了文革,我讲了上面的故事。他接了话茬说:嗨,你说的是牛小顺么。

文革期间,杨晓国在山西临汾蒲剧院工作。他说的牛小顺,是蒲剧著名的老艺人。文革开始两年,铺天盖地歌颂毛主席。牛小顺一个老艺人,不知道怎么想出了这个点子。他自家的宿舍前有一小块空地,他收拾了整好,分割成五畦,种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长成青苗以后,浇水锄草除虫——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由于对毛主席大不敬,他很快被打成反革命,批判检查交代没完没了。牛小顺眼看过不了关,一日回家,一头扎进自家水缸溺水自杀了。

不久我到山西运城去,遇到著名的蒲剧编剧杨焕育,说起此事,他也说,对的对的,就是牛小顺。

牛小顺,蒲剧地方戏著名演员,工小旦,后改刀马旦。山西稷山人,1930-40年代投师学习蒲

剧,搭班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一带演出。新中国成立后返回晋南,任运城蒲剧团二队副队长。嗓音洪亮,武打利落。唱做打兼长,尤以把子功出众。在蒲剧刀马旦中屈指可数。1958年进入蒲剧院青年团,以传艺授徒为主。《蒲州梆子志》记载,生卒年月 1917-1968,“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这些干巴巴的文字后面,其实包藏着一个血泪故事。

从这个时候起,关于种一个“毛主席万岁”的

(上接第 25 页)沮丧、绝望的心情看,他与革命的冲突,已然在一个隐蔽的精神空间中发生。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革命,说到底,他是一个孤独的异邦人。说是“异邦人”,不仅因为国籍不同,带决定性意义的还是身份问题。他是一个革命者,却始终保持他的独立自由的天性,而坚决地建造他的革命乌托邦。美国学者雅各比在他论述乌托邦思想的著作中区分了其中的两种倾向: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从白求恩的文字遗产看,他明显地属于后一个传统,属于这一个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者,据雅各比的说法,往往到最后变成为“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

回头再读读白求恩在他创建的战地模范医

故事的,不再是传说。它无疑已经成了史实。也许在别的地方还是传说,但在我这里,它成了铁定的历史。如果考史,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例实证。我不否认传说的功能,千万人千万里多年传播这个传说,起码证明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是真实的。而今我要告诉世人,这不是想象。这是发生在1960年代晋南的一件真实的往事。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编审)

(责任编辑 李 晨)

院的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当佩服、崇拜,并且像主宰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如果白求恩不是过早辞世,我们仍然无法预想他是否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这个端点,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偏离了蓝图的方向。他仆倒在路上。而那里,正是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地方。

(作者系广州学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声望听力
好听力 · 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508A/B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9030029 号

读《告别饥饿》

● 徐迅雷



书太多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买来的,此书覆盖彼书,待购的,彼书遮挡此书。《告别饥饿》就是因此而迟到我案头的书,2008年岁末再版重印,2009年8月我才买来,一气读完,相见恨晚。

《告别饥饿》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不是遥远的文豪泰戈尔的小说《饥饿的石头》,也不是切近的女作家虹影的长篇《饥饿的女儿》,它是新华社4位中青年记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的西行采访录——被誉为“新《西行漫记》”。让我们记住这4个让人尊敬的名字: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他们都是江浙一带人,在那时却深入到中国的西北角,历时半年深入农村采访,成就了这部注定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书稿。

成书前4位记者写了大量内参,通过新华社发给中央领导参阅。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的决策,对中央下定决心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改革,起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成了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见该书序言)“我们认为,固原这样的贫困地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唯一出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我们的稿件乘直升机来到位于六盘山下的张易公社。他快人快语,当场就明确肯定了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产到户’很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见该书再版前言)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时总书记是这样的工作作风,看了内参后在第二天就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的当地进行考察。由此也足见新华社记者的内参所具有的分量与力量。要感谢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他是有识见的新闻人,他对这4位将深

入西北农村的记者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斯诺的

《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

“讲真话,写实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励下,四位记者一路跋山涉水,走过晋陕甘宁边区三十九个县、一百多个公社,他们走村串户,行程万里,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最透彻他们心扉、最让他们感到苦痛的,就是满目的贫穷、遍地的饥饿。原先我总以为,只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才有饿殍遍地,原来在中国的西北角,在“文革”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依然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贫困穷苦!

那是贫穷的残酷。那是真实的力量。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写出如此真实篇章的记者相比,我这个在今天也位忝记者之列的人,感到深深的羞愧。请看开篇不久就描述的一节——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见该书第15页):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东方红》,最早就是由陕西佳县(即葭县)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来的。他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民间歌手。……这个县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众生活可以,李有源唱《东方红》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后,不行了。我们到佳县,县委书记让我们到李有源的老家张庄去看

看。……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我们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农民歌手李有源若是知道他死后是这样的日子，或者，他如果知道《国际歌》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还会引吭高歌“他是人民大救星”吗？谁人能够预计得到，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一大二公，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该书的序言里讲到一个细节：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历史是真实的，正因为真实而呈现出非一般的残酷。西北，尤其是陕北，那是重要的革命“摇篮”。可是，无论在延安，还是在王家湾，或者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今非昔比，多少民众却挣扎在贫困的死亡线上，正像书中一开篇就说的：“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当年，王家湾高文秀老汉的窑洞里，设了毛主席的伙房，老人家回忆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作者感慨：“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我们明显地感到，现在的王家湾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书中许多评述性的话，简明、准确、锐利，三言两语，入木三分。比如：“贫困到了极限便接近着死亡。”接近死亡，这是什么样的情景？书中所描述的，搁什么时候都让人心惊：“路过平凉的静宁县时，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丢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对象的悲剧”；“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

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合作化’以后，她家的土地归了公，羊也交了公，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她对革命革了几十年，反而搞成这样子常常迷惑不解，非常伤感……”

人活于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吃饱肚皮，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生存权”。一个政权如果总不能让自己的子民填饱肚子，那是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执政下去的。其实，百姓脖子上只要没有“绳索”，他们是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养活自己的。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位名叫戈色令的农民，其遭遇让人感慨万千。戈色令可谓农民中的精英分子，在建国初期，他修水渠、栽旱柳、种沙蒿、养牛羊，发家致富，这在当时的西北，是多可贵的模范行为。可到了1958年，统统都要公社化，戈色令的行为变成了“搞资本主义”，他的那些“个人财富”全被集体收走，到了“文革”时，境遇更惨，他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身体完全垮了，疯疯癫癫不能再干活，1972年戈色令死了，时年才五十五岁……戈色令的经历充分地证明了：大集体的“阳关道”，远不如老百姓自己的“独木桥”。

我所在的江南，是“种什么长什么”的，西北的黄土高坡，如果好好种树、科学种地，也是有不少收成的——至少不至于饿死人。然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时光，却延续着，延续着。简说原由，就是“极左”二字。比如一家最多只许种两棵“自留树”，多一棵都要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更有“学大寨运动”中那极左“套餐”，已深入了人心。一些地方，硬是“因地制宜”，搞什么“人造小平原”，当地干部就说，搞小平原那也是为了“好看得多”——原来“政绩工程”不是现在才有的，老早就曾经在西北黄土高坡上一展英姿了。所以，那时的山西成了一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最大的“经验”传播，当然就是从1964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

我们可以告别饥饿，但我们无法告别历史。把如此真实的“当代史”呈现在公众面前，这需要多大的胆识。谁说新华社记者只会写“新华体”的消息？这4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调研，在当代中

国新闻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半年采访归来之后,他们将采访笔记梳理了一遍,结合此前的内参,形成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书稿先后送给了近十家出版社,当时编辑看了都说好,却没有一家敢出版——因为内容太真实太尖锐。直到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终于将书稿付梓,取名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哦,《告别饥饿》,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十八年之后才与公众见面。著名作家贾平凹读过后这样说:“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的傅上伦老师相识。“为新闻而来”的傅老师后来调到浙江工作,他曾回忆那次采访,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杭州日报》发表他口述的回忆长文,其中讲到:陕北之行,十分艰苦。许多村庄不通公路,全靠两条腿走。我清楚记得,子长县西部丛山中有个叫白季茆的生产队,离县城九十多里,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发起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白季茆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专程到他们那里调查,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迎接我,他们是盼望着中央给个好政策呀!

(上接第70页)因为这就是美国。牧师从小受到白人的欺负,因此他恨白人,这就是美国。我的白人外祖母恨黑人,我的黑人牧师恨白人,这就是美国,我必须得接受。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话锋一转:“可是我的牧师犯了一个错,他把他所遭遇的一切当成美国的所有。他忘记了,我的竞选口号是我当了总统都会改变,他的错误就是他没有看到美国的伟大之处不是现在的缺点,而是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接受改变的民族,改变才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

奥巴马这番出人意料的讲演,又把他和林肯联系在了一起:大家把他称为“全美国历史上唯一能够媲美林肯的领导”。

惊动胡耀邦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进行考察的内参,只有500字,是傅上伦捏着手摇的老式电话筒口授,新华总社那边记录成稿的。说的是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罢工”了,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收割。原因是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但县里坚决不同意。上下对着干,“火山”要爆发。而胆子大一点的队干部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胡耀邦看到那500多字内参,深受震动,当天就决定亲赴六盘山,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这就是新闻的力量,尽管是“中国特色”的“内参新闻”。

顺便说一句,傅老师一直关心我在《都市快报》的“快报快评”专栏,曾与我有过一次关于新闻评论的深入探讨交谈。没想到的是,2008年11月,也就是《告别饥饿》再版的当月,原本说话精气神十足的傅老师因病突然辞世,留给我们恒久的遗憾。

历史总是追随着时间,但它却注定要落在时间的后面;为了让时间中的历史不至于褪色得太厉害,那么,记者让自己记录的新闻成为信史,就是一个重任大责,光有诗人“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浪漫,那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社会职务: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杭州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还有,他跟麦凯恩做竞选辩论,主持人问两个候选人如何对付邪恶,麦凯恩回答“我打败它,我击溃邪恶。”而奥巴马说,“我们当然是要打败邪恶,可是我告诉各位,很多邪恶就是我们美国人在过去自以为是所造成的,在打败他们之前我们要先检讨自己。”

这就是奥巴马。这仍然是奥巴马的真诚。奥巴马是智慧的,雄辩的,才华横溢的,但他更是真诚的。唯有真诚方能赢得信赖。所以,美国选择了奥巴马,奥巴马赢得了美国。在信息化时代,奥巴马将跨越时空,赢得更多的人。因为人们都能够看到,都可以倾听,都在比较,都在思索。

(作者单位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
(责任编辑 李 晨)

由奥巴马摆酒平风波说起

• 魏兴荣

2009年7月16日,哈佛大学著名的非洲裔教授亨利·路易斯·盖茨在结束了中国之行乘车从机场回到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时,由于房门被意外卡住,盖茨和他的司机猛力撞门。此时,有路人怀疑他们行窃,拨打电话报警。当班的白人警官詹姆斯·克劳利赶往现场。警员表明执法身份后,要求盖茨出示证件,以证明他是房主。但盖茨只出示了哈佛大学的工作证,而不是有住址的驾照,而且大骂警员们种族歧视,声音高的无以复加。克劳利等人劝阻无效后,只好将暴跳如雷的盖茨带往警察局,关押了数小时。但盖茨后来坚称自己交出了所有证件。

7月22日,奥巴马在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警察逮捕盖茨的行为十分愚蠢,证明美国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奥巴马表示,他在哈佛法学院上学时就认识盖茨教授,他们既是师生也是朋友。他说,盖茨教授是一个学者,对他实施逮捕毫无道理,而剑桥市警方就是因为盖茨教授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才对他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

针对总统奥巴马的言辞,警方大为不满。7月23日,代表全美警察的“国际警员兄弟会”主席戴维德·贺尔维称“奥巴马的言论伤害了警界绝大多数正直的警员”。7月24日,剑桥市警察局长哈斯表示支持克劳利,称奥巴马总统的批评令警员“受到严重伤害”。克劳利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在办案过程中并无过失,总统不了解事实。剑桥市巡警协会也要求奥巴马向全体执法人员道歉。

面对警方的批评,奥巴马亲自与克劳利通电话后,公开承认自己“用词不当”,并且表示将邀请克劳利和盖茨到白宫喝一杯,化干戈为玉帛。7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野餐餐桌宴请“种族案件”的当事双方喝啤酒,副总统

拜登也来作伴。四个人在树下一起喝啤酒,气氛轻松,大批传媒被隔在一定距离外拍摄采访,这次引人注目的会面被传媒形容为“啤酒高峰会”。但奥巴马会面前强调,所谓风波其实是被夸大和渲染,邀请克劳利与盖茨到来不是一场啤酒群英会,而是几个大男人喝两杯、聊聊天,减少怒气的同时自我反省。奥巴马称希望能以此事为鉴,花更多时间聆听彼此,改善种族关系,而不是互相指责。

盖茨教授说,愿意用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教材。他说他非常希望借总统的白宫之请,与白人警官达成和解,平息种族对立情绪。而且盖茨还表示,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让总统因为支持自己而受到冲击。而警官克劳利也不再陈述他在整个事件中的委屈,并称即使事件发生之后他也一直都是奥巴马的“粉丝”。

一场波及敏感问题“种族之争”的风波在一场总统主持的温馨啤酒会中优雅地落下帷幕。

奥巴马摆酒息风波的信息在网络披露后,引起了包括中国网民在内的强烈反响和网友热议——

湖北十堰网友发帖:天佑美国。事情看似很小,但关系到了根本,首席管家亲自出面,让人感慨,让人佩服,让人向往。

河南平顶山网友跟帖:天佑美国。他给全人类树了一面旗帜,一个榜样。一个理想国!

河南漯河网友跟帖:上帝保佑美利坚,伟大的国度,伟大的人民(白人,黑人,黄人,亚洲人,南美人)!祝愿所有心中有美国梦的人能够实现!

河北唐山网友:这样的国家,想不强大也难。

广西玉林网友:在中国,下级永远不敢向上级要求“道歉”,不管你是否有理!上级尤其是首脑人物,也永远都是对的,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事情。

黑龙江佳木斯网友：差别啊，距离啊。

奥巴马此举看似轻易、轻松，却给这个世界太大的感官冲击和心灵启悟。

一位知名教授风尘仆仆从国外归来，却打不开自家的门，情急可料。但雪上加霜的是，在撬自家门时，竟被负责的路人疑为盗贼向警方报案，警察迅疾出现场，且履职认真，盘查详尽，令情急中的教授火上浇油，对警察大喊大叫。因教授提供不出带住址的证件，又被警察带走。客观地说教授急愤有情可原，而警察带走教授也是秉公办事。这场本不该发生的冲突发生了但仍有它发生的自然逻辑。问题是被带走的人是黑人、是奥巴马的老师，总统便在不了解全面情况的前提下贸然指责警察“行为愚蠢”，此举确实有失轻率，致使一起与种族无关的普通执法事件陷入了“种族歧视”的敏感漩涡，从而引发了警察的群体抗议和媒体的非议。

在沸沸扬扬的抗议面前，身为总统的奥巴马如何处置呢？他刻不容缓，亲自给当事者克劳利警员打电话了解情况，并公开承认自己“用词不当”，然后邀请当事者双方到白宫喝啤酒！

一场“啤酒峰会”把事件的转折推向了顶峰，推向了一个令人遐思无限的美妙境界，推出了一段传遍世界且必会载于美国历史的政坛及驾控调处人际关系的佳话。

人与人之间，官与民之间，如果都有这样的境界和善意，还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还有什么芥蒂不能疏通？还有什么隔膜不能弥合？奥巴马的行为，恰恰体现了我们眼下最时髦也最令人期待的那个字眼——和谐。同时，它也向人类宣示：真正的和谐是如何以真诚和智慧营造的。

网友们的某些点评看似有点儿尖刻，但却十分客观。试想一下，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如果某个省部级一把手（更遑论国家领导人了）指责某个派出所的民警“行为愚蠢”，这个受委屈的警察敢抗议吗？整个公安系统敢站在这个警察一边，为其辩护，并集体要求领导向警察道歉吗（如果某个组织敢提这样的要求，一定会被视为鼓动闹事、破坏稳定而受到警告或加以惩治）？小小警察敢奢望省部长会在道歉之后还要请他去喝啤酒吗？恰恰相反，那个被领导指责“愚蠢”的民警极有可能因惹了大麻烦（错抓了撬自家门的少数

民族教授，该教授又恰恰是最高长官的老师！）而战战兢兢，恐怕他正迫不及待地向教授道歉，或在来不及道歉的情况下就被停职也说不定。总而言之，领导的话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最高标准，领导永远没有错。在领导的定论面前，群众没有辩解的余地，没有质疑的空间，也没有辩解和质疑的习惯。在大大小小的领导面前，下级、下级只有俯首听命、逆来顺受、保持一致的份，而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久而久之，下级都变成了顺民、弱民甚而愚民，这对说错话或办错事的领导则是一种纵容，使他们错起来无后顾之忧。在这种领导犯错下面却鸦雀无声的情况下，领导当然无须道歉更无须请人喝啤酒了。难怪那位佳木斯网友发出“差别啊，距离啊”的慨叹。

此时，我也联想起另一个故事。在希拉里贵为第一夫人的时候，有一次她在一大学演讲结束之后，便和几位朋友站在大厅门口大声说笑，这时走过来一位看门老头，他训斥道：“门厅内不准大声喧哗。”希拉里听罢，连忙道歉，赶紧和几位朋友匆匆离开大楼。在那里，一名看门老头和总统夫人是完全平等的。当看门老头履职告诫总统



奥巴马

夫人的时候,总统夫人没有狗仗人势,她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也是一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守规则。有人由此评价到:有何等素质的国民,就有何等素质的领袖,领袖是人民培育出来的。此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想补充一句更客观的话:有何等的政治体制,就有何等品味的公民。专制体制、高压政策下的公民,都易患软骨病,都普遍缺乏“刚性人格”,因为公权太强大了,民则被迫软弱。

再说奥巴马啤酒会。奥巴马就是奥巴马,他的出手不凡让世人再次领略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缺乏起码的从政经历的黑人小伙是凭何才能而一举击败德才兼备品貌俱佳雄心勃勃胜券在握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而荣登总统宝座的了。因一句轻率指责的话引起警界大为不满,全美警察的“国际警员兄弟会”批评奥巴马的言论伤害了所有正直的警察,剑桥市巡警协会要求奥巴马向全体执法人员道歉。奥巴马从善如流,又是亲自和受委屈的警察通话,又是公开道歉。此事到此也就完全说得过去了,完全够意思了!人们也完全可以给予谅解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已道歉!但奥巴马竟然又请双方当事者去白宫喝啤酒!并声称此系“几个大男人喝两杯、聊聊天,减少怒气的同时自我反省”。这场出人意料的啤酒会如春风细雨极度地滋润了矛盾三方当事人的心灵,也使人类集体沐浴了一种用真诚和境界缝制人际天衣的美妙技巧所带来的灵魂洗礼。

喝啤酒的无限功效说明它绝不是一场政治秀,而是用此极致方式体现即使坚冰也可以被化解的人的善意与智慧。试想,奥巴马仅是道歉虽可泯灭警察们对总统的怨声,但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之间的怨怼或许还有想和解的愿望呢?由此触及的种族矛盾的遗患呢?高居尊位贵为总统的奥巴马能请两个心存芥蒂(其中一个还对总统也曾有怨言)的普通人来喝啤酒,彼此原有的怨气、怒气当然就会在杯盏交错中烟消云散。这里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有浸透啤酒醇香的轻松气氛,只有坦诚交流和彼此的聆听,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每个人尽享的做人尊严。

多么令人感动的美妙时刻啊,这一刻,它所激起的无限涟漪将绵绵荡漾开来,轻拂着、温煦着白人、黑人及世间各色人种的心灵,启迪着人

类的心智——如果人类都具有这样充满诚心善意的智慧,还有什么人间的矛盾不能化解呢?还有什么心灵间的沟沟坎坎不能迈过呢?

这就是奥巴马啤酒会的直接功效之外的典范作用。这就是奥巴马的过人之处。

赞誉奥巴马的人,将奥巴马的一些经典行为称之为“智慧”。在此,我又想起了一段关于林肯的故事。

1863年6月的一天(那时美国不朽的《解放黑奴宣言》尚未宣布),一位为自由而战的卓越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被一参议员带进了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并与总统进行了长时的关于给予黑奴自由的坦率交谈。这位几年前还不能安全进入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的黑人在6个月后的一个即席演讲时这样讲述他晋见总统的感受:“我愿意告诉你们他是怎样接见我的,就像你们见过的一位有身份的人会晤另一位有身份的人那样!我告诉你们,我感到自己在那里简直太神气了!你们想知道他留给我的印象吗?这正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正如你们每个人习惯称呼他的那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亚伯拉罕·林肯是集伟大、明智和雄辩于一身,他还是不会以伟大的亚伯拉罕、明智的亚伯拉罕和雄辩的亚伯拉罕这类称号名垂青史的,如果这个国家得救的话,他将以诚实的亚伯拉罕名垂青史。他将以这个称号流传下去,将和华盛顿的名字并列地写在我们这个辽阔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不至于贬损后者。”

由此我也认为,正如公众所评价的,奥巴马确实是智慧的,但也正如他的偶像林肯一般,他更是真诚的。

让我们回想一下奥巴马竞选时的一个片段:他的黑人牧师赖特是他家的好友,赖特对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他攻击美国白人,攻击美国政府。此事被麦凯恩拿出来攻击奥巴马,并令奥巴马的支持率迅速下滑。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碰到这种危机时刻,奥巴马会说些道歉的话,并批评和疏离这位牧师朋友,以摘净自己,挽回选票。可他在题为《更完美的联邦》的讲演中说出的却是另外一番话。他开宗明义并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可能跟这个牧师切断关系,正如我不能跟我的白人外祖母切断关系一样”(下转第67页)

柏林墙倒塌目击记

• 李 英

1989年秋天,我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远赴联邦德国。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两个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德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两德统一的大幕徐徐拉开。我亲眼目睹了柏林墙怎样倒塌,两个德国怎样走向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又面临怎样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大墙时代

长途跋涉来到德国,还未完全洗去旅途的征尘,就被身边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风暴的中心是柏林。

柏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城市。二战结束后,根据有关协议,战败国德国被美苏英法划分为四个占领区。1949年8月14日,西部美英法占领区合为一体,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苏占区)也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民德)”;作为战前首都的柏林位于东德的中东部,它也被划为四个占领区,苏占区称为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美英法占领区称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个州,它如同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之中。

这个孤岛,曾经爆发过一场国际危机,把“冷战”演绎到了极致。

1948年,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线,企图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他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于是美国 and 英国从这一年6月26日开始每天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持续达11个月,直到1949年5



一道冰冷的水泥墙将鲜活的柏林分成东西两半

月4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而结束封锁的原因是,西方对东德的交通运输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特别是西方禁止进口东欧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资。

在空运的日子里,流传着一个“摇翅膀叔叔”的故事,说的是美军飞行员霍尔沃森驾驶的运输机上,不仅有各种生活必需品,还特地给西柏林的孩子们带去了泡泡糖。为了让孩子们在飞机短暂的停留期间尽快赶到机场,他约定了暗号,在无数的飞机中,摇晃着翅膀的那一架就是带来糖果的飞机。孩子们看见这架飞机,便喊着“摇翅膀叔叔”的名字,欢呼雀跃地跑来。

封锁取消了,冷战还在升级。

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3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

1961年8月12日晚上,100多万柏林人上

床睡觉时,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

8月13日,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剩下的也随即关闭。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

更令人惊异的是,一道被称为“柏林墙”的东西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原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经历》中,对建立柏林墙的背景、经过及其影响作了详细介绍。他说:

从1949年到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西德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既无安全措施,也不进行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每天有50万人通过边界。那时在柏林西区至少有80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对东德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和货币投机,并且大量招募东德劳动力。这些动态的发展引起了东德政府的高度警惕。1961年8月3日至5日,华沙成员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共产党协商后提出,应按一般主权国家的做法对东西德、东西柏林边界进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昂纳克说,他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责成他采取行动。于是,8月11日由人民议院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欧洲和平面临严重威胁。8月12日部长会议通过对边界实现“有效控制”的协议,下午4时乌布利希签署命令,8月13日(星期日)零点开始行动,国家人民军战士和工人战斗队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建起了一道“柏林墙”。

最初,“柏林墙”只是一道铁丝网,以后才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砌成。全长166公里,其中46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9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两堵墙,靠西的

那堵墙高3.5米至4米,墙头铺设有一根直径为35厘米至40厘米的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50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至7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瞭望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在建柏林墙的同时,东德在与西德的整个边界上也拉起了铁丝网,挖掘了松土带,并逐步设立了严密的观察哨所和自动射击装置(直到80年代,在西德人的强烈抗议下,同时西德政府以两笔巨额贷款为交换条件,才使这些自动射击装置被清除)。1963年6月21日,东德国防部长签署了一条命令,对居住在距离边境线30到100米范围内的东德居民进行严密控制,任何人企图进入这一区域都需要特殊许可,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在东西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边境线一带还埋设了70多万颗地雷。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初见柏林墙

我第一次看见柏林墙是在踏上德国的第一个夜晚,火车穿越东西柏林边界时,透过车窗,只能隐隐见到一条河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闪着点点波光,河边有一道长长的墙体的黑影。有人叫了一声:“看,柏林墙。”就这一瞬间,我从东方跨入了西方。

几天后,姐姐专门带我去看柏林墙,由于这道墙的特殊意义,它已经成了柏林的一大景观。

当我站在柏林墙边,与它如此近距离接触

时,心情很是异样。最初,我并没有激动震撼一类的感觉,反倒有一些失望:这就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柏林墙?不过就是一道长长的望不见头的几米高的水泥墙,平淡无奇,实在谈不上艺术价值。但我仍然被触动了,因为我看到西德人民已经把这个平淡呆板的墙体变成了生动幽默的画廊,不知哪路高明的画家在这块巨幅画布上任意挥洒想象涂抹色彩,艳丽的色块,抽象的图案,粗大的字母……它们要表达什么?宣泄什么?渴望什么?期待什么?

目光越过柏林墙,看到墙东边的勃兰登堡门,它是另一个作为柏林城市象征的古迹,建于1788—1791年,是当时古勃兰登堡国的雄伟城门,二战中,勃兰登堡门被炸得遍体鳞伤,只剩下断壁残垣。唯令柏林市民慰藉的是,大门没有倒塌,它依然象征吉祥,给人从头开始的力量。今天,一堵灰暗冰冷的墙体在它的粗大门柱前拦腰一刀,使这座大门变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柏林墙与勃兰登堡门之间,有一片开阔地,也叫隔离防护无人区,登高而望,发现那里有许多设施:铁丝网栅栏——瞭望塔——混凝土防御掩体——信号装置——探照灯——警犬巡视路线——边防军巡逻线——岗哨边界线及标杆——车辆陷坑——立柱式高杆照明灯——坚固的控制带(死亡带)——上面装有钢管的混凝土板块墙。此外,在一定距离内装有自动发射装置。任何人想穿越这一死亡地带,都是不可想象的。

墓地背后的故事



柏林墙下的墓地

我们沿着柏林墙漫步,突然,一块小小的墓地跳进眼中,十几个白色十字架伫立墙脚,用松枝和鲜花编织的花圈靠在十字架前。

姐姐告诉我,柏林墙建起之后,仍然有人不顾危险冒死翻墙逃跑,士兵便向逃跑者开枪,酿成了一幕幕悲剧。西德人在墙的这一侧为死难者立起了墓碑,一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冤屈的灵魂,每一个十字架上都标有死难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我发现大多数是“无名氏”,最后一个死者的死亡日期是1989年2月5日。后来每当我想起这最后一位死难者,都不禁扼腕叹息:“若是他有先知,再耐心等待几个月……”

(我回国后查阅了资料得知,从1961年到1989年的28年间,在柏林墙和两德其他边界上,共有201名“偷越国境者”被开枪打死。最后一名是一个叫古埃勒夫的20岁青年。1989年2月5日晚9时,古和他的朋友高迪安试图偷渡柏林图尔托夫运河,在匍匐3个小时后,古因触动警报器被打死,高受重伤。)

这块墓地真正让我心灵震颤,同时也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东德人是怎样越过如此严密如此恐怖的柏林墙防御设施而逃跑的呢?多年以后,我找到了这些故事。

对于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并不是诸如东西方冷战、对立、分裂这样的政治大概念,而是数以千百计的小人物悲壮而辛酸的传奇,这些小人物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为盛产童话的德国再添新的童话,这个新童话的名字,叫做“不自由,毋宁死”。

第一个翻墙人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的时间,是1961年8月13日中午12点37分,以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

13日下午,第一个翻墙人出现了。一个青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三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三名警察,于是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

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钻栏杆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被困在东柏林的一位青年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实地查看,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这个青年开着一辆又小又矮的车,把自己的女友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了西柏林。

在这样的“奇迹”接连发生了两起之后,恼怒的东德警察在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再钻过去了。

“地道战”

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的家人通过挖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怎样承受的。这个孩子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人群发表感想如下:“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火星撞地球”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体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冲进西柏林。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一个叫布鲁希克的东德人和他的同伴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

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自造潜水艇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小潜水艇真是一个奇迹,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跳楼者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分的,曾经有一家三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失望地打算散去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大楼,警察砸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地一跃而下……

再后来,西德人又改用汽车接应跳楼者,顶部预先布置好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接到人后马上退回西柏林。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胜利大逃亡

柏林墙,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刚到德国的我并不知道,这本书新的一页正在掀开。

谁都没想到,搬动柏林墙上第一块石头的,竟然是匈牙利这个中欧小国。1989年5月,匈牙利作出一项决议,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清除埋设在260公里长的边界的地雷,打开了东欧国家与西方的通道。6月27日,匈牙利外长久拉·霍恩和奥地利外长阿洛依斯·莫克象征性地在奥匈边界剪断第一截铁丝网后不久,一批批东德人便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的机会逃往奥地利,继而逃往西德。

新一轮更大的逃亡潮开始了。

我们在德国,几乎天天从电视上看到这样的镜头:

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借着去匈牙利旅游的机会,越过匈奥边界,进入奥地利,然后再从奥地利奔向西德境内。西德对东部的同胞兄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

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样成为东德人逃往西德的通道,一群群东德人开车来到布拉格,他们把车扔在大街上,飞快地跑进西德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成人们先把孩子和玩具熊举过栏杆,送进使馆的后院,然后乘警察未赶到时自己也翻墙而入。这时警察赶来了,把正在爬栏杆的人往下拉,院里的人则把他们拼命往里拽……第二天,更多的人来了,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警察也多起来,把使馆围住,可是难民更多,又把警察围起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要西德政府接受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近2000名东德难民汇聚在华沙的西德使馆门前,他们不愿再回东德,要求做一名西德人。

时间很快到了9月底,一直密切关注局势的西德外长根舍心里明白,他正在目睹东德的灭亡,他要为这堆烈火再添把柴。9月30日,根舍飞抵捷克首都布拉格,在使馆阳台上亮相,他宣布,在那里的东德人将获准移居西德。话没有讲完,听众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西德的一位护送者随这些东德移民一同乘

车奔赴西德,当他目睹列车梦幻般地从东德通过时,田野里,城市中,人们自发地向飞驰的列车挥动白手帕,铁路工人把大盖帽拿在手中向他们致敬。几个小时过后,当列车载着这些乘客隆隆驶入联邦德国的境界时,他们齐声高呼:“自由!自由!”

游行去

一列列专车载着成千上万的叛逆者奔向西方,这使东德局势更加动荡,人民要求开放边界自由来往、要求两德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东部各大城市不断举行游行集会,广场上的群众讲坛和教堂里的自由辩论磁石般吸引着普通市民。莱比锡市更是欲罢不能,渐渐形成每逢星期一下午人们上街游行的势头。东德民众不仅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更喊出“我们是一个民族”、“德国,统一的祖国”等新口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10月9日这一天,7万莱比锡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这个时候,“当局要严厉镇压”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

市民埃瓦尔德·迪姆一家三口参加了游行,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宣布了十点方案,内容就是反革命活动将于10月9日在莱比锡被镇压下去。“我非常担心。”他说,“……下午6点,我和妻子、女儿开车去市中心参加游行,我们加入了迪特里希环行路那里的行进队伍(当时看到机动警察全副武装,手持手枪、冲锋枪,在卡车里待命,所有的卡车都没有熄火)。我们高呼‘我们是人民!’如此壮观的场面使我受到鼓舞。我们的眼里闪烁着泪花,说不出是出于喜悦还是害怕。我们不知道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会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我们不愿再像从前那样活着,管它降临到头上的会是什么!”

古德龙·菲舍尔,32岁,排版员,10月9日那天,她和丈夫早早把6岁的女儿哄上了床,然后她要 and 丈夫一起去参加游行,可丈夫不让她去,要她远远地避开政治,但是这次,她坚决要和丈夫一起去。她拉着丈夫的手,沿着库厄大街一路走去。

37岁的家庭妇女苏珊·罗梅尔也赶来参加

游行,她看到教堂被包围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参与一场流血的冲突。她并没有回家,而是勇敢地走进教堂,那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示威者们唱着神圣的歌曲,还不断地高喊口号:“我们坚守在这里!”“我们是人民!”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不要暴力!”

11月4日,东柏林爆发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近百万人走上街头。

11月7日东德政府辞职了。

11月9日

1989年的11月9日,修建了28年的柏林墙被推倒了,分裂了40年的东西德人民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

东德宣布开放边界的方式是极富戏剧性的,而导演这场剧的竟是一个意大利记者。在当天下午的每日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会议的民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已经准备收场了,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里卡多·艾尔曼拼命摇晃手臂要求提问,他问道:“您曾谈到当局犯了很多错误。您是否认为您不久前介绍的旅行法草案是个错误呢?”

沙博夫斯基掏出一张纸,宣读了新旅行法草案内容,然后似乎顺便似的说:“私人出国旅行今后无须说明理由。”接着又说:“按我的理解,该法从现在就生效,立即生效。”这时是下午6时53分。其实,当时新草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东德的其他领导人正在闭门开会,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而东德的群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都清楚地听到了沙博夫斯基的话。世界各大通讯社几分钟后纷纷转发这一消息,称“民主德国开放边界,柏林墙不复存在。”

西德首都波恩,联邦议院中断了会议,向媒体发表声明。社民党主席弗格格尔说:“这一决定表明,柏林墙在28年之后,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义。”议员们激动地唱起了国歌。

晚8时15分,第一批约80个东德人已经来到柏林墙边打探消息,到晚上11时,过境关卡上聚集了3万人。11时过后不久,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尼布林下令打开了边界。其实,晚上9时30分左右已有数不清的人从东柏林进入了西柏

林,东德的边防警察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了。

柏林墙首先被东柏林的青年冲开,通过决口向外涌出的人越来越多,悬念变成了狂欢,西德人也冲向东柏林人涌入的入口处,给客人们抛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敲击客人们的两冲程卫星牌小汽车以示欢迎,他们甚至把客人汽车排烟的汽油味称为“自由的芬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相互拥抱,新结识的朋友痛饮香槟,人人眼里闪烁着泪花。在勃兰登堡大门前,德国人爬上了墙头,像马戏团里杂耍戏那样,把一个又一个的人拉了上去。他们打着V型手势,齐声呼喊:把墙推倒!并唱起“我们必胜!”有些人开始用锤子砸墙,似乎想拆掉这座墙。

负责防卫城市中心地带的英国军人派出了一支军乐队来到柏林墙跟前演奏,不仅为了缓和气氛,而且也是为了对局势加以不露声色的观察,英国人还提供了不带标记的大轿车把游客送过去。

“就像圣灵降临,就像天使张开了翅膀……”一位亲眼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德国作家这样写道。

走向统一

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厅门前,东西柏林人几十年来首次联合聚会。西柏林市长在集会上说:德国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989年秋,柏林墙被东德人民冲开了缺口

威利·勃兰特,这位在1961年柏林墙出现时的西柏林市市长、在1969年首创对东方缓和政策的前西德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政治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本来就是同根同属,现在又携手共进。”

西德现任总理科尔也登台亮相,他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来,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普通的东德民众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顾及威胁,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在西德免费喝豌豆汤、喝啤酒,免费看西德的足球比赛、听摇滚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西德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开业,让每个东德人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礼”。然后东德人就去商店买随身听和牛仔装,甚至连商店在这个时候也不用遵守严格的法定营业时间。东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铁可以不买票,西柏林还备有城市游览图、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费提供给东德人。

当我又一次看到柏林墙,已经是1989年的年底,我从拜罗伊特市回到柏林过圣诞节和新年,此时正是人们欢庆柏林墙开放的日子。与上次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了岗楼的肃杀和墓地的悲凉,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柏林墙已打开了两个口,分别标识着:入口,出口。进出柏林墙两侧的人流排着长队。过了一会儿,有人爬上了柏林墙墙头,这在那段日子里已是常事,接着,又有许多人往上爬。墙下的人也不甘寂寞,不少人看来是有备而来,他们拿着锤子、凿子等工具,拼命地凿墙。后来,德国人把凿墙行为美誉为柏林墙的“啄木鸟”。

从1990年6月13日起,300名东德士兵和600名西德士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6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铺设道路,250块柏林墙墙体以1万到15万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布统一,两个德国并存的现象一去不复返,10月3日被定为“统一日”。



戈尔巴乔夫改写了历史

1990年夏秋之交,我父亲来到德国探亲旅游,刚到柏林,就嚷嚷着要去看柏林墙。这一

天,姐姐和我陪他同往,来到了勃兰登堡门前。远远的,我们便看见,柏林墙已经没了,这一段最有代表性的墙体全被拆除了。父亲深感遗憾,一个劲儿说:不应全部拆掉,应该留下一段作为历史遗迹,历史文物。

柏林墙虽然没有了,但新的景观出现了,那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许多人在摆地摊,出售各种与柏林墙有关的东西。最多的当然是柏林墙石块,五颜六色,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价格从一马克到数十马克不等。

突然我们发现,除了柏林墙石,还有不少苏军物品在摊上出售,军帽、军用望远镜、皮包、徽章等等。

这场“最后的拍卖”预示着,苏军已完成使命,将撤出德国。

苏联军队在东德土地上有35万驻军,是惟一能够阻止德国统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几十年中,苏军用坦克和刺刀维持着东欧集团的团结统一,50年代,苏军镇压了东德的民众起义,扼杀了匈牙利的民主派势力,60年代末,坦克轧平了“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

德国人对苏联的感情很复杂,他们把苏联称为“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缩写),我记得看过德国人画的一幅漫画,将CC-CP画成一副镣铐,绑在德国人身上。我曾经问过几个德国人(包括西德人和东德人)对苏联怎样评价,他们有人耸耸肩手一摊不说话,有人鼻子里哼一声,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贴耳,亦步亦趋,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第二任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惟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了闪电般的行动。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



现在仅存的柏林墙遗址,它将永久保留

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

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和苏军的占领费压得东德喘不过气来,这些费用相当于1949年东德全部国民收入的16.9%。整座整座的工厂被拆掉了,运往苏联。强制获取的德国物资用封闭的火车,由警犬和武装部队看守着,运过了边境。那时候东德人的食品、生活用品都是配给制,面包、土豆、菜汤,每人每天就那么点。这样的生活到1958年才结束。

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偿还。

80年代末,充满“新思维”的改革派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

爆发了惊天动地的“1989年革命”。

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德国的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作为一名统一德国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

无论以后历史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德国人都会感谢他,两德统一,他功不可没。戈尔巴乔夫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

几年以后,一位德国记者采访了已经卸任的戈尔巴乔夫,请他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想法。戈尔巴乔夫说:

我相信,我们和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行动是顺乎时代精神和具体的历史瞬间的要求的。……198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中欧国家的民主改革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察觉,新思维的政策开始在现实中结出硕果。关于德国问题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形成的。……此外,德国人本身所表达的意愿不容忽视。如今情况表明,当时形势所迫,不可能把一切都考虑得面面俱到。但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目的已经达到。

(作者系《工人日报》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 思源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历史与俄罗斯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紧密相联而又“负相关”的,俄罗斯宪政史上两个转折性关头——1918年1月的解散立宪会议和1991年的“8·19”政变——同苏共的兴衰也密不可分。下面我们按照历史的逻辑简要剖析俄罗斯宪政的否定之否定进程。与此同时,也能一览苏共百年轨迹。

一、历史转折

追求宪政

1898年3月俄国“劳动解放社”、“斗争协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3年7月—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大会通过的党纲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政”,成为当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等人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政”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

1917年3月(俄历2月)沙皇宣布退位,毫无准备的俄罗斯陷入混乱。临时政府仓促上台,是为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

当时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在政治体制上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攻打冬宫的炮声中开幕,会议进行中传来消息:已经逮捕了临时政府几位部长。绝大多数党派和组织并不赞成这样做,拒不接受这个事实,纷纷宣布退出代表大会并离开会场。会议主席团从多党派变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临时政府被推翻的原因之一,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内、国际问题的机关。他还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焦点只是召开的“快慢”问题。

布尔什维克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一党独揽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各党派的反对。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国际主义者派(即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派)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派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知识分子群体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有人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不了三天。但是,这些反对派最终“还是向暴力让步了”。

1917年11月12日—25日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按期进行。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



列 宁

斯大林

个小组。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之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11月28日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1917年12月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秘密警察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用暴力惩办反革命分子、奸细、怠工者和投机商人。根据列宁所确定的原则,“契卡”拥有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监督党政军的大权。

否定宪政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

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此时,在左派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示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立宪会议所在地的。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行业工会纷纷支持。

当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出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彼得格勒的工人再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

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宪政梦想!

“一月剧变”之后,俄国的国内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1919年有个坦率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的确,内战就是一场围绕立宪与否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

90年后俄国人反思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和宪政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无疑发生了悲惨的断裂,这个断口在哪?就在1918年的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否定宪政。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受伤,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契卡”进行全面搜捕,枪毙了7000多人。既包括武装叛乱而被俘虏的军官,也包括昔日盟友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党员。整个社会革命党被逐出苏维埃政权。

1918年夏至1921年初,苏俄逐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即强行收购农民的余粮和饲料,此举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和反抗。

二、七十四年专政

恐怖时代

1921年3月8日—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观点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活动。实际上开启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历史阶段。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

1922年8月4日—7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大会讨论了反苏维埃党派问题。决议要求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采取镇压手段。于是,苏俄其他政党逐渐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局面。

1923年10月8日俄共(布)党内开始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派认为,党的机关已经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它凌驾于全党之上,压制普通党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改变“一派统治”的局面,建立党内民主,撤销关

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1924年1月26日—2月2日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每25000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农民则要125000人选一名。

1924年5月23日—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会议期间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了列宁生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又称“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对一些中央委员作了评价,认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由其他人来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同托洛茨基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没有感到斯大林是最危险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接受列宁遗嘱中的建议,而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列宁遗嘱。

1925年12月18日—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次年被逐出苏联,后在国外组织“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人刺杀,次日因伤势过重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他的生命终结方式,也许为这句话又增添了一个注释。

1929年1月斯大林第一次宣布联共(布)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



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右倾反党集团”。

在 1928 年至 1931 年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 500 万富农被镇压。斯大林后来曾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积极地进行反抗的富农及其子女常被枪决。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了。由于农业集体化和随后的饥荒，导致 1450 万人死亡。仅仅因为饥荒，乌克兰就有 500 万人死亡，北高加索有 100 万人死亡。

1933 年 4 月 28 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 1933 年—1934 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1917 年—1939 年间，苏共进行了四次清党。1917 年—1922 年被清洗出党的有 22 万人，1925 年—1933 年有 80 万人，1934 年—1935 年有 36 万人，1935 年—1939 年有 122 万人。前后总共有 260 多万人被清除出党，是 1939 年的正式党员 159 万人的 1.6 倍。

1934 年 1 月 26 日—2 月 10 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有 270 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只有 3 名代表对基洛夫投了反对票，但大会宣布的结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 3 张反对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人提议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没有接受。斯大林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内，出席此次大会的 1225 名代表中有 1108 人（占 90%）被捕，其中多数人死于监禁中，大会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人（占 70%）被捕并被处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 1934 年 12 月 1 日被暗杀。几天后，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要加快对恐怖组织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要从重判处，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

1934 年 12 月 28 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将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 14 人，作为涉嫌暗杀者处死。不久，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全部消灭。随后，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

据《米高扬回忆录》载，苏共二十大以后已查明，从 1935 年 1 月至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联大约有 2000 万人遭到迫害，其中 700 万人被枪决

（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中有 2 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

1936 年 8 月—1938 年 3 月莫斯科陆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原党内反对派领袖被当作人民公敌处以死刑。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 24 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 14 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 60 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 54 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 15 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 13 人中，有 9 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 120 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时期所杀死的共产党员是沙皇俄国处死的布尔什维克人数的 8 倍。

在肃反中，苏联陆军遭到镇压的有 36761 人，海军 3000 余人。其中包括苏联 5 个元帅中 3 人、4 名一级指挥员中 3 人、12 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67 名军团团长中 60 人、2 名海军最高指挥员（全部）、6 名一级海军指挥员（全部）、15 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 9 人、2 名一级军政委（全部）、15 名二级军政委（全部）、28 名集团军政委中 25 人、97 名师政委中 79 人、36 名旅政委中 35 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被处决或监禁，还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军籍。在 1938 年—1940 年同“人民公敌”斗争中，各军区司令员全部被撤换，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 90%、军和师一级管理人员的 80% 以及参谋长的 90% 被撤换。清洗的结果是军队高级干部素质下降，红军战斗力减弱，给苏联卫国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书》。后一文件主要是确定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1939 年 9 月—10 月苏联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分别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三国被迫同意苏联在其境内驻军。次年 8 月，在苏联军事压力下，三国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39 年 11 月 30 日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匈

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在苏联被处以死刑。在30年代肃反中,几千名长期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和政治避难者以“托派分子”或“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此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将约600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犹太人交给了法西斯德国。

1952年10月5日—14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这次大会使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达到顶峰。

解冻时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1953年12月18日苏联判决贝利亚和在内务部、国家全部工作的6人死刑,从而沉重打击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体系。

1956年2月14日—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他还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恶果。

1964年10月14日、15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近2000万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下台后部分改革措施被撤销。

改革时代

1985年3月10日又一位继任苏共最高领袖仅一年多的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终年74岁。次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尔后苏联5次修改宪法,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确认多党制;(2)取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定,确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发展原则;(3)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制;(4)改革国家权力机关体制,实行议会民主原则;

(5)设立苏联总统、副总统职位,由苏联总统直接领导内阁,确立三权分立原则;(6)成立专门的苏联宪法监督机关——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7)取消马列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等。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共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罚。这个数字是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捷夫在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的。受罚人数(没有包括被判处死刑者)分类统计如下: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放;4200万集体农庄庄员被吊销了国内护照,从而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更换工作和旅行的权利。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1988年6月25日,莫斯科约600人集会,要求建立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纪念碑。

1988年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重申改革的政治和道义的力量源泉是“民主、公开性和责任”,认为“国家必须付清过去的旧账”,改革才能向前推进。

1989年1月5日苏共中央决定撤销1934年在各州成立的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为受迫害者平反。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在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举行集会,向即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示威者的标语口号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不要专制独裁者”、“不要极权主义,要民主的俄罗斯”等。

1990年2月5日—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建议提前召开苏共二十八大,认为苏共不应享有优越的政治条件;主张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叶利钦在发言中对准备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提出10点向宪政民主方向修改的意见。

1990年3月12日—15日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补充宪法和实行总统制的决议,修改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条款,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

1990年6月16日—17日“苏共民主纲领派”运动拥护者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规定该派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7月2日—13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共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视为前进目标。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叶利钦在发言中称,党内应当允许各纲领派别并存,党的名称应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发布命令,要求电视广播系统独立于政党组织。

1990年全年在苏共1900万党员中,退党的有270万(1989年退党的只有12.5万),另有130万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他们不交纳党费,也不再参加党的会议(1989年采取这种态度的只有7.6万人)。两项合计,在1990年一年内,苏共力量的损失已超过1/5,基础已经动摇。

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能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1991年6月12日,“民主俄罗斯”总统候选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俄罗斯全国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中,以“推动激进的改革”纲领,以57.35%的高票,一举击败雷日科夫、巴卡京等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

1991年8月13日苏联各报公布了新的联盟条约《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正式文本。预定于8月20日第一批共和国在条约上签字。

三、曲径通幽,重上宪政轨道

风云突变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

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又称“白宫”)。

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

人心向背

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已聚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讲的镜头。评论家说,这与七十四年之前十月革命时列宁在群众大会上挥动手臂的场面有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二者的意义截然相反罢了。当年列宁要推动俄罗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今叶利钦则呼吁俄罗斯结束专政,重新向宪政民主迈进。

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柏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

与此相对立的保守派则采取了声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公开发表拥护声明的主要有三家——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议员团”、自由民主党及全苏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委员会。

从8月20日上午开始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

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已经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拒绝执行违宪命令

“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机、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不执行这个命令。”

“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国外某些军队向平民开火的惨剧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余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

政变失败

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随着8月20日、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就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

苏共威信扫地

“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无异于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

8月23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当他辩解说“并不是俄共全党和全体党员都参加了政变阴谋”时,台下喊:“就是俄共参与了政变”。在白宫门外,尽管有三卡车精锐警察的保卫,戈氏还是遇到了愤怒的示威群众,他们把两个口号连在一起了:

“审判苏共!”

“解散苏共!”

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磋商之后,到8月24日晚上才做出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此外,他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正在自行崩溃中的苏联共产党又遭到一次致命打击——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并非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在于失去民心。

列国独立 宪政归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早的三个发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国家元首,于1991年12月8日在明斯克郊区的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会晤,共同作出了解散苏联、成立独

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

1991年12月12日俄罗斯议会批准了《别洛韦日协定》,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其他所有人民代表,包括共产党议员,都对协议投了赞成票。在白俄罗斯,只有担任国家总统的卢卡申科对协定投了反对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早在《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履行了对解散苏联的协定的批准程序,几乎没有争议。

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书》,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等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不同寻常的圣诞夜,1991年12月25日19时,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点38分,印有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暮色苍茫中从克里姆林宫上黯然降下;13分钟后,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徐徐升起。这天,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还差5天。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履行了苏联停止存在的法律手续。联盟院通过了终止苏联存在的声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恢复其原有的独立地

位。

1992年4月21日第六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对197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第七次修改补充。

1993年6月5日叶利钦总统召集由各联邦主体、各社会联合组织代表等700余人参加的制宪会议,企图撇开议会制宪。议长哈斯拉托夫坚决反对。后来,双方达成妥协。制宪会议拟定出以“总统方案”为基础,考虑到“议会草案”的意见,基本上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三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

1993年11月10日叶利钦总统抓住时机公布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四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从此结束了1991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以总统和议长为首的两方,围绕未来宪法是否确认总统制而进行的长达两年的斗争。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即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

经过近一个世纪漫长曲折的弯路,俄罗斯终于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重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轨道。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致 中)



中老年人永葆青春活力 就看《金色年代》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 月刊 16开 全彩印刷

■ 每期售价8元 全年12期 订价96元

精彩作品回顾 金色话题

50岁 新生活的开始
给自己多一点自信
珍惜生活中的母爱
圆当年一个梦
科学养生 适合你才好
以书相伴 培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从怕退休到盼退休
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 经历是一笔财富
享受多彩的生活

名人情怀

妻子眼中的王蒙: 幽默 童心 宽容
姜昆: 中老年人的12345
张悦: 在“夕阳红”里变得更年轻
张少华: 明星老太的胡同生活

享受生活

巧做家务好健身
平民大厨也能成明星
快乐结伴游四方
巧手缝纫 让生活更美丽
摄影发烧友 我比别人活得值

和谐家庭

给妻子送礼的学问
1975-1985 十年婚俗话变革
再婚家庭 重组幸福
把话说到心坎里
儿女的婚事 父母的心事
家有保姆 让我欢喜让我忧
父与子 你成长我也成长

营养饮食

夏日食苦 胜似进补
美容果醋 越喝越健康
春来渐暖时蔬香
浑身是宝猕猴桃
调味品 调味道更调健康
最平民的养生珍品-山药
打好养胃战
美味果汁营养多
如何挑选有机食品
健康高明“食油法”

更多内容请浏览www.jsnd.net.cn 咨询热线 (010) 51692575-18

读者来信摘登

请小人物入史

中国传统的史传,一向是大人物所专有的。既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又是名士名流的行述,小人物是难得与史传结缘的。清代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只有一二品大员,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资格。

太史公司马迁算得上是个有“平民情结”的史学家,所以在他的《史记》中,你才能够找到若干个小人物的事迹,如刺客、小贩、磨刀匠之类。但后来的史书中就难以见到小人物的踪迹了。“五四”以后,小人物的史迹才渐渐受到先进文化人的重视。晚近,才有更多的明眼史家和文化人注重记述一些有价值的小人物史迹。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小人物,地位低微者也。但纵观历史,正可谓“人物虽小,常有可观者焉”。许多小人物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参与创造历史的作用不可小觑。齐桓公宠爱的易牙不过是个手艺不错的厨子,却在齐桓公死后乱国;小人物勃鞞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使晋文公免除了被颠覆的危险;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事发的起因只是一个叫徐福的跟班办事不力。

有眼光、有见识的史家、学人是不会抛弃有记述价值的小人物的。《左传》里记载了不少小人物的事迹,有寺人、屠夫、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刺客等,且多是有名有姓的。胡适是个大学者,却曾为一个名叫李超的被宗法制度压迫致死的普通女学生写过传记。当代比较注重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有朱东润、张中行、孙犁、姜德明、杨绛、陈宛茵等。朱东润写的《李方舟传》,其主人公就是寻常巷陌中一位有崇高理想的普通妇女。张中行写的《汪大娘》,记的只是一位在旗的女佣。红学家周汝昌曾经极为称赞这篇小传对于了解旗人历史的认识价值。孙犁常写身边的小人物,如《老同学》《觅哲生》等。从这些小人物的琐事中,能看到时代风云在普通人身上烙下的印记。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里,写了一位动乱年代中的“极左大娘”。陈宛茵的《乡曲之侠》写的是“文革”中一位敢于挺身保护所谓“牛鬼蛇神”的小人物,里边不光有整人乱国的“勇敢分子”,也有许多侠肝义胆之士。姜德明曾写过《俗人小品》,记录了几位不平常的凡俗之人。

虽然当代人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作品已有一些,但总体来说为数不多。用文学笔法写小人物的作品尽管不少,但却算不上是信史。其实,对于史家和文化人来说,是应当重视为小人物写史的。写史的体裁可以是多样的,未必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像张中行的《世说》笔法、杨绛的忆旧笔法都是极好的。小人物甚至应当主要靠这种“野史”来记述、流传。这种“野史”的价值对于后人来说,大概未必比鲁迅称赞过的旧式野史的价值低。重要的是,后人能够从这些“野史”中获取昔日那些不可小视的小人物的信史。

河南读者 郭远庆

大饥荒年代的两句民谚

《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刊登了李治国的《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读后让我不由又想起几年前偶然听到的有关大饥荒年代的两句民谚:

2005年夏天,我乘火车由北京返开封,同车厢有两位50多岁的妇女在聊天,一位是河南兰考县人,一位是皖北某县人(县名忘了)。俩人的话题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期各自所在农村饥饿的惨状。此二人都是大饥荒的亲历者。那位安徽妇女说,她们村就饿死不少人,当时偷东西吃非常普遍,甚至还有偷偷把死人拖回家吃掉的事件发生。她还说了当时流传的两句民谚:“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

这两句产生于大饥荒年代的民谚,虽然寥寥十四个字,却字字千钧,特别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广大农民的生存真相,与当时公开宣传的两句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成为一实一虚截然相反的两极。

几十年后,到了21世纪,这两句民谚从那位安徽妇女的口中说出,我听到后仍极为震惊,感慨万千,并且刻骨铭心。读了李治国的文章后特写出来,为该文以及相关书籍补遗。我以为,这两句有关大饥荒年代的民谚必将随同大饥荒的史实同为历史铭记!

河南读者 薛开震

更正

本刊2009年第5期53页左栏第18行“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此文”署名的4人应为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没有陈沂。陈沂当时是总政文化部部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

第7期《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中提到的张志新、丁祖晓、马绵征(文中误为马锦征)均为女性。

欢迎订阅2010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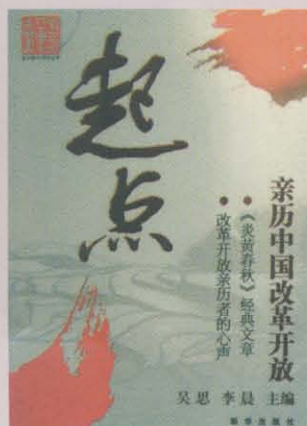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老鬼：我斗胡耀邦

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

白求恩 —— 孤独的异邦人

大跃进中的村办劳动教养

种一个“毛主席万岁”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 元